

## 明代關中地區的講學活動(上)

陳時龍\*\*

相對於陽明講學風行江南的盛況而言，明代北部中國的講學氣氛較為薄弱。綿延近200年的關中講學堪稱北方講學的代表，且表現出與陽明講學不同的特點與面貌。關中講學淵源於明初薛瑄，經私淑薛瑄的關中學者段堅、周蕙的宣導而趨於本土化。15世紀末期、16世紀初，王恕父子與提學官的講學活動及興復書院的舉措，為嘉靖初年以呂柟、馬理為代表講學高潮提供了物質與組織的基礎。嘉靖初年，南大吉、南逢吉兄弟在渭南宣講陽明之學，為關中地區注入新的思想成份，而楊爵對於陽明學的習染與抵制則說明陽明學始終未能成為關中講學的主流。萬曆年間，提學官許孚遠兼具湛學後學及陽明學信徒的雙重身份，一方面使關中講學中融入湛學的成份，另一方面使其門人馮從吾、王之士數人的思想調停於程朱、陸王之間。作為明代關中講學的殿軍，馮從吾的講學活動是呂柟之後的又一個高潮，對明代關中講學作了一個總結。明代關中之講學在應對外來因素的反復衝擊、吸納、回應的同時，始終能堅持「讀經重禮」、「關學意識」等特質，從而構築了一個相對僻靜而隔絕並有著自己的發展脈絡的講學世界。

關鍵詞：講學、關中、明朝

---

\* 本文承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啟動基金資助。兩位匿名審稿人對本文修改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 一、引言

講學之風，是明代學術最突出的特點之一。清儒程嗣章說：「明代道學，固不及洛閩之醇，而窮經通儒，亦罕聞焉。獨講學之風，較前代為盛。」<sup>1</sup>明代理學，無論朱子學或陽明學，皆以講學為其傳播、交流及學派建構之機制。故自上世紀 40 年代錢穆先生〈王門之講會〉一文發表始，<sup>2</sup>對於明代講學的研究始終是明代思想史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50 年代，泰州學派的「平民講學」受到更多關注，<sup>3</sup>而復於 80 年代逐漸為學界所忽略。伴隨著思想史研究對社會史與文化史相結合路徑的講求，對明代講學的研究在上世紀 90 年代中期成為明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一個熱點。<sup>4</sup>其中，對於地域性講學運動的梳理，頗為重要。在這一方面，呂妙芬先生對寧國府、吉安府、浙東數地講學活動的研究以及戴霖先生對洛陽附近地區講學活動的研究，為地域性講學活動的研究開創了很好的範例。<sup>5</sup>對於關中地區講學活動的研究，正是想沿著這

<sup>1</sup> 程嗣章，《明儒講學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清道光四年刻本），頁1。

<sup>2</sup> 錢穆，《王門之講會》，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第21冊，頁393-397。

<sup>3</sup> 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sup>4</sup> 近十餘年間，先後有數種著作出版，相關論文刊行近20篇。讀者可參閱：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吳震，《明代知識界講學活動系年(1522-1602)》（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陳時龍，《明代中晚期講學運動：1522-1626》（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中純夫，〈王畿的講學活動〉，《富山大學人文學報紀要》，第26期（富山，1997），頁398-478；福田殖，〈羅念庵《冬遊記》研究——王門講學活動的一個場面〉，《陽明學》，第6號（東京，1994）；牛建強，〈明代中後期講學風氣的擴張及其變異〉，《史學集刊》，第53期（吉林，1993.10），頁49-56；張藝曦，〈講學與政治——明代中晚期講學性質的轉變及其意義〉（台北：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陳來，〈明嘉靖時期王學知識人的會講活動〉，《中國學術》，第4輯（北京，2000.10）；戴霖〈明代洛陽地區講會論略〉，《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第21卷第4期（洛陽，2003.12），頁17-20；李才棟，〈關於書院刻書與講會等問題的一封信〉，《教育史研究》，第48期（北京，2001.04），頁34；吳宣德，〈「講會」定義獻疑〉，《教育史研究》，第50期（北京，2001.10），頁6-8。

<sup>5</sup> 呂妙芬，〈明代寧國府的陽明講會活動〉，《新史學》，第12卷第1期（台北，2001.03），頁53-112；呂妙芬，〈明代吉安府的陽明講會活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5期（台北，2001.06），頁197-272；戴霖，〈明代洛陽地區講會論略〉，頁17-20；陳時龍，〈十六、十七世紀的徽州府講會活動〉，《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0期（台北，2003.05），頁133-184。

樣的研究方向，繼續梳理一塊相對被冷落的區域。

然而，爲什麼選擇關中地區而不是別的地區的講學活動作爲研究對象呢？首先，我們先明確一下「關中」的範圍。《辭海·地理分冊·歷史地理》釋「關中」：「關中，古地區名。所指範圍大小不一：(1)秦都咸陽，漢都長安，因稱函谷關以西爲關中，……是泛指自關以西戰國末秦故地，包括秦嶺以南的漢中、巴蜀在內。(2)在秦嶺以北範圍內，又時或包括隴西、陝北，……時或專指今陝西關中盆地。(3)至於將關中解釋作居眾關之中，如潘嶽《關中記》以爲『東自函關，西至隴關』。」<sup>6</sup>在明代，「關中」大約相當於第二種解釋，相當於今陝西、寧夏和甘肅三個省、自治區。例如，馮從吾輯《關學編》，於明儒中即收入蘭州段堅、山丹衛周蕙。誠然，明代北方地區的講學活動的規模與影響，確不如南方的講學。但是，關中地區也許是唯一的例外。晚明關中地區的講學甚至與無錫東林、徽州府、江右齊名，同時遭受反講學的閩黨的攻击。這是筆者關注關中講學活動的第一層原因。其次，作爲宋代理學的核心地區之一、理學史上濂洛關閩之一的關學，經張載門人「洛學化」及金、元時期北方少數民族統治之後，「比洛閩之學幾乎落後了一個時代」。<sup>7</sup>那麼，關中講學在明代的復興，是基於什麼樣的思想資源和機構性遺產？關學方面的研究成果頗多，<sup>8</sup>然而結合學者的活動與思想來對明代關學作系統的梳理的研究，卻並不多。《關學編》一類的學案體裁的著作，亦多半是「身在此山中」者的作品，其視野受到限制，無法清晰地呈現關中理學盛衰背後的外來思想資源的影響。這是筆者關注關中講學活動的第二層原因。其三，陽

<sup>6</sup> 《辭海·地理分冊·歷史地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8)，頁96。

<sup>7</sup> 陳俊民，《張載哲學思想及關學學派》(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17。

<sup>8</sup> 陳俊民，《張載哲學思想及關學學派》；陳俊民，〈關學序說〉，《陝西師大學報》，第35期(西安，1982.06)；董健橋，〈關學討論綜述〉，《人文雜誌》，第22期(西安，1983.04)；李曉東，〈關學的範圍及特點〉，《西北大學學報》，第38期(西安，1983.05)；王曉清，〈元代關學試探〉，《孔子研究》，第37期(北京，1995.03)；武占江、孟昭信，〈關學、實學與心學〉，《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第9卷第4期(西安，1999.10)；朱曉紅，〈呂柟與理學〉，《西北大學學報》，第107期(西安，2000.05)；劉學智，〈馮從吾與關學學風〉，《中國哲學史》，第43期(北京，2002.08)；賈俊俠，〈馮從吾與關中書院的教學思想及教學特點〉，《唐都學刊》，第19卷第1期(西安，2003.01)。

明學在嘉靖年間的風行，推動著明代中晚期講學運動的發達。那麼，在遠離陽明學核心的關中地區，其講學活動的淵源如何？其受陽明學講學的衝擊究竟有多大？其對於陽明學的接受或回應的程度究竟有多強？對於這些問題的解答，也許有利於我們對陽明學在明代思想界的地位以及明代講學運動發展軌跡的複雜性，有更深一步的認識。也就是說，本文的目的，一為梳理明代關中講學盛衰之軌跡，二則試圖揭示出明代關中講學之特質。有一點可以確信，在關中講學的歷史進程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相對僻靜而隔絕並有著自身發展脈絡的講學世界。

## 二、外來資源：河東之學在關中(1460s-1470s)

明代關中講學興起的淵源，必須追溯到山西河津縣的薛瑄(1389-1464)<sup>9</sup>。薛瑄與明代關學的關係，自明清迄今，學者對此都有過明白的闡述。<sup>10</sup>河東之學構築了明代關中地區講學復興的思想資源的原因，可分兩個層面來解釋：其一，地理上的接近。河津縣隸屬山西布政司平陽府蒲州，與陝西韓城乃一水之隔。其次，薛瑄在明初學界的影響。明初講學風氣不盛，學者欲鑽研理學，從師的選擇相對比較有限。北方的朱子學代表人物是曹端(1376-1434)<sup>11</sup>與薛瑄。他們的學問，也構成後來北方河南、陝西、山西等地講學的思想資源。在後來熱衷講學的學者看來，薛瑄講學的成果並不顯著。例如，曹于汴就說

<sup>9</sup> 薛瑄，字德溫，號敬軒，諡文清，永樂19年(1421)進士，官至禮部侍郎。他是明初繼曹端之後的理學大家。其父薛貞(1355-1425)，教其《四書》及聖賢書。永樂7年(1409)，在父親任職的玉田縣，薛瑄更接觸到範仲仁、魏希文等「元者儒」，學問大進。宣德3年(1428)，薛瑄被差往監湖廣銀場，潛心《性理大全》，著《讀書錄》，遂成一代大儒。其學以「復性」為宗，篤信朱子，嘗言「自考亭以後，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

<sup>10</sup> 明儒劉宗周說：「關中之學，皆自河東派來，而一變至道。」其門人黃宗義亦說：「關學大概宗薛氏。」參見黃宗義，《明儒學案》，收入《黃宗義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頁12、172。《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63，〈關學編五卷條〉亦說：「明世關西講學，其初皆本于薛瑄。」相關研究，可參見馬濤，〈論薛瑄與明代的關學〉，《孔子研究》，第23期(濟南，1991.09)。

<sup>11</sup> 曹端，字正夫，河南滎池人，永樂6年(1408年)舉人，授霍州學正，學者稱月川先生。

過：「然論其世而師友之者則亦鮮矣。」<sup>12</sup>據年譜，薛瑄曾先後於正統 8 年(1443)至正統 14 年(1449)、天順元年(1457)至天順 8 年(1464)兩個階段間講學於河津縣城內大街西的舊宅，也即後來經門人改造後的文清公祠堂、薛文清公書院。<sup>13</sup>當時聽講的門人，有江西、陝西、河南等地的學者，而以山西河津、陝西韓城學者最多。<sup>14</sup>其中，最著名的陝西門人則有張傑(1421-1472)<sup>15</sup>、張鼎(1431-1495)<sup>16</sup>、王盛<sup>17</sup>。綜言之，15 世紀後半期薛瑄思想傳入關中的途徑大約有二：嫡傳的張傑、私淑的段堅(1419-1484)<sup>18</sup>。

薛瑄門人中，張傑論地位不如張鼎。然若以講學論，張傑對後來關中講學的影響大於張鼎。王恕說張鼎「不一、二年遂得文清公性理之傳」。<sup>19</sup>張學智先生說：「《明儒學案》所載能傳河東之學的關中學者，首推張鼎。」<sup>20</sup>這類說法，皆需重新檢討。張鼎從學薛瑄，起因於張鼎之父在蒲州為官。其時張鼎方十五、六歲，自謂「惜乎少年，不及向學」。<sup>21</sup>歸咸寧後，張鼎即為諸生，隨即中景泰癸酉(1453)舉人、成化 2 年(1466)進士，仕途通達，升至右僉都

<sup>12</sup> 曹于汴，〈薛文清公行實錄纂跋〉，《仰節堂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3，頁18。

<sup>13</sup> 王盛，〈薛文清公書院記〉，收入王鴻編，《薛文清公行實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明萬曆16年吳達可刻、崇禎重修本)，卷3，頁7。

<sup>14</sup> 王盛，〈薛文清公書院記〉，頁7。

<sup>15</sup> 張傑，字立夫，號默齋，鳳翔人，正統6年(1441)舉人，學者稱「五經先生」。

<sup>16</sup> 張鼎，字大器，號自在道人，咸甯人，學者稱「自在先生」，著有《仕學日記》、《自在詩文》、《蠹齋博稿》、《張大器語錄》。薛瑄《讀書錄》為閻禹錫編輯，而文集則得張鼎搜輯校正，刊行於弘治2年。

<sup>17</sup> 王盛，字懋德，號竹室，韓城之澗南裏人，成化乙未(1475)進士，官至山西布政司參政，著有《移風社》、《竹室詩》，參見《(乾隆)韓城縣志》(續修四庫全書影乾隆49年刻本)，卷6，〈賢良〉、卷14〈著述〉。

<sup>18</sup> 段堅，字可久，號柏軒，任南陽知府時改號「海嶽清風」，晚年額其齋「容思」，學者稱容思先生，門人私諡文毅。參見彭澤編，《段容思先生年譜紀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影道光3年重刻本)。相關研究，參見馬序，施培新，〈段堅和他的哲學思想〉，《西北史地》，第13期(蘭州，1984.04)，頁104-106。

<sup>19</sup> 王恕，〈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張公墓誌銘〉，《王端毅公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明嘉靖三年劉欽刻本)，卷6，頁8。

<sup>20</sup> 張學智，《明代哲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25。

<sup>21</sup> 張鼎，〈序薛文清公文集〉，《關學宗傳》(民國10年陝西教育圖書社鉛印本)，卷10，〈張大器先生〉，頁7。

御史巡撫保定、戶部右侍郎。綜觀張鼎一生，大半耗於仕途，故其理學之名晦而不彰，講學活動也很難明晰。清嘉慶《咸寧縣志》卷 15 經籍志內有「張大器語錄，保定巡撫咸甯張鼎撰」一則，當指張鼎之講學語錄。然而，張鼎的講學，不過於宦遊間因地而講，並沒有專門在關中傳授河東之學的痕跡。張傑則不然，其在關中地區的講學要活躍得多。張傑年長於張鼎 10 歲，從師薛瑄時任趙城訓導，年齡應該也比張鼎大，後來的宦途卻不順利，大部分時間「以講學為事」，所以可能比張鼎更明晰薛瑄之學。他在鄉里的講學，頗有名氣，所謂「用五經教授，名重一時」。巡按御史欲聘其為城固教諭，被他拒絕，說：「古之學者，從事高遠，求以明道也；今專務辭章，以決科為事。學日疏，道日敝，仆不能為也。況鄉黨小子相從頗眾，豈能遠及他方耶？」<sup>22</sup>其〈復馬茶台辭聘書〉，大概說的也是此事。信中，張傑說：「鄉黨小子相從頗眾，豈能遠及他方耶！」<sup>23</sup>

在張傑的講學交遊圈中，段堅是很重要的一個。辛全說張傑「與蘭皋段先生堅、趙侍御英、河東李學博昶、秦州周布衣蕙相與論學，而段(堅)尤稱契厚」。<sup>24</sup>段堅與張傑，彼此間常有書信往來，討論薛瑄之學。例如，段堅曾寫信給張傑說：「觀來柬，示『斷然行之』之語，足見立夫進道之勇。老先生(薛瑄)之錄，不出敬、信二字。又見讀書之要，以如是之資識，加以持敬功夫，於道也直易易也。」<sup>25</sup>可以說，張傑與段堅的交往，是段堅接觸薛瑄之學的途徑之一，也是薛瑄嫡傳者與私淑者之間的一種聯繫。概括地說，段堅與薛瑄的關係是通過三個人實現聯接的：鳳翔張傑、河南閻禹錫以及西安李昶。程嗣章說：「(段堅)學於禹錫以溯薛氏之旨。」<sup>26</sup>沈佳亦說：「(段堅)得閻禹錫、白良輔以溯文清之旨。」<sup>27</sup>他與閻禹錫的交往，約在景泰元年(1450)前後南遊

<sup>22</sup> 郭定，〈默齋先生祠〉，《(乾隆)重修鳳翔府志》(中國方志叢書影清乾隆31年刊本)，卷10，頁7。

<sup>23</sup> 張驥，〈張默齋先生(附文錄)〉《關學宗傳》，卷10，頁5。

<sup>24</sup> 辛全，《理學名臣錄》(理學備考本)，卷2，頁19。

<sup>25</sup> 彭澤，〈成化五年己丑五十一歲條〉，《段容思先生年譜紀略》。

<sup>26</sup> 程嗣章，《明儒講學考》，頁11。

<sup>27</sup> 沈佳，《明儒言行錄》(明代傳記叢刊本)，卷2，頁79。

途中。成化5年(1469)，段堅還曾親訪張傑於鳳翔。段堅與張傑之間的良好關係，構成「蘭州——鳳翔」一線的學術交流。

這種學術交流很快擴展到西安府。其間的關鍵人物，則是周蕙。<sup>28</sup>多種資料顯示，周蕙「從學」段堅於蘭州。呂柟說段堅自萊州歸後，聞小泉「志節高峻、言不空發」之名，遂「訪諸秦州，數與交遊講論」。<sup>29</sup>此事殆李顥所言「成化戊子(1468)段公(堅)至小泉訪之(周蕙)」。<sup>30</sup>因此，段堅與周蕙之交，應該在成化4年前後。周蕙與段堅之間，沒有明顯的師承關係，彼此殆在師友之間。何大復說：「(周蕙)先生於容思先生，其始若張橫渠之於范仲淹，其後若蔡元定之於朱紫陽。」<sup>31</sup>這是說，周蕙學問入門雖由段堅，卻不在段堅門人之列。對於關中講學，周蕙的影響是轉折性的。劉宗周評價周蕙說：「關中之學，皆自河東派來，而一變至道。」周蕙超越段堅而近道的關鍵，在其作為「職業講學者」的遊學之癖。黃宗羲說：「(周蕙)為蘭州戍卒，聞段容思講學，時往聽之。……容思曰：『非聖弗學』。先生曰：『惟聖斯學』。」<sup>32</sup>非聖弗學，是對於聖學之外的異端的排斥；惟聖斯學，是對於聖學強烈的責任感。顯然，較之段堅，周蕙有著更強烈的以聖賢自任的決心。作為一介布衣，周蕙還擁有更多的自由遊學的時間。周蕙遊學西安府時，培養了李錦(1436-1486)<sup>33</sup>、薛敬之等著名關中學者。此後，薛敬之傳呂柟，成就明代關學的第一個高峰。誠如清初學者李顥所說，「先生崛起行伍之間，闡洛閩絕

<sup>28</sup> 周蕙，字廷芳，山丹衛人，後居秦州之小泉山，學者稱小泉先生。馮從吾《周廷芳蕙傳》稱周蕙初名「檜」，後更作「蕙」。沈佳，《明儒言行錄》、馬理，《陝西通志》(稀見方志叢刊，影嘉靖21年刊本)則皆作「周桂」。按，《明史·周蕙傳》(卷282，頁7203)以周蕙為「秦州」人。「秦」殆為「秦」之誤。

<sup>29</sup> 呂柟，〈容思先生年譜序〉，《涇野先生文集》，卷8。按，此序不見於彭澤，《段容思先生年譜紀略》。

<sup>30</sup> 李顥，〈觀感錄〉，《二曲集》(北京：中華書局，陳俊民標點本，1996)，卷22。

<sup>31</sup> 馮從吾，〈周廷芳蕙傳〉，收入焦竑，《獻征錄》(上海：上海書店，1987)，卷114，頁41。按，張載向學，始於范仲淹「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一語。蔡元定欲執贄于朱熹之門，朱熹卻說「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

<sup>32</sup> 黃宗羲，〈河東學案上·布衣周小泉先生蕙〉，《明儒學案》，卷7，頁144。

<sup>33</sup> 李錦，字在中，號介庵，咸寧人，天順6年(1462)舉人，官至松江府同知。

詣。……思庵薛子不遠數千里從之學，……爲一時醇儒。其後呂文簡又問道於薛，以集關中大成。淵源所自，皆先生發之，有功於關學甚偉！」<sup>34</sup>因此，從一個角度看，呂柟作爲薛敬之爲門人，突顯了薛敬之在關中學術傳承中的地位，進而突顯了周蕙在關中講學中的地位；從另一個角度看，則是周蕙上承河東之學，下啓關中講學之流。

總之，薛瑄之河津講學，開北方數省學者從事理學之風氣。一河之隔的陝西，受薛瑄浸染頗深，嫡傳的門人分布於陝西韓城、咸寧、鳳翔等地。然而，嫡傳門人講學或局限於某一區域，或爲宦宦遊於外地，對於關中地區的講學的帶動作用並不明顯。直至 15 世紀 60 年代，在西起蘭州、東至長安的範圍內，薛瑄的嫡系門人與私淑者始結構成一個相對鬆散的學術交流圈。代表性的人物即張傑、段堅、周蕙。此一講學圈的第一種特徵是：無論與薛瑄是否有譜系上的傳承，他們皆以薛瑄之學爲宗旨。私淑者段堅，<sup>35</sup>議論多與薛氏合拍。段堅說：「天之生人，有此形即有此心，有此心即有此理。擴充此心之理，而不物於物者，爲聖爲賢。」<sup>36</sup>此與薛瑄所言「聖賢千言萬語之理，無不散見於天地萬物之中，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統會於此心之微密之地」，<sup>37</sup>如出一轍。段堅重視「敬」，亦與薛瑄「主敬」之旨合拍。<sup>38</sup>因此後人對段堅有「文清之統，惟公是廓」、「私淑而有得者」之譽。<sup>39</sup>此講學圈的第二種特徵是：講學的流動性小，亦缺乏書院、講堂爲根據地，且記錄多散佚。

<sup>34</sup> 〈周小泉先生(附錄)〉，收入張驥，《關學宗傳》，卷10，頁5。

<sup>35</sup> 段堅沒有師從薛瑄。段堅，〈刊二程全書序〉，收入王烜，《泉蘭明儒遺文集》(民國石印本)，卷上，稱薛瑄「先正」而不稱師。景泰4年(1454)段堅中進士，似亦未與當時在朝的薛瑄有過接觸。然《明史》談及段堅與薛瑄的關係時，一則曰「堅之學私淑河東薛瑄」，再則曰「段堅，薛瑄門人」。殆段堅之學於薛瑄密近，故對於《明史》編纂者來說，既難以斟酌，似亦無須斟酌。

<sup>36</sup> 段堅，〈教民俗言序〉，收入王烜，《泉蘭明儒遺文集》，上卷，頁17。

<sup>37</sup> 薛瑄，〈與楊秀才書〉，《敬軒薛先生文集》，卷12，頁3。

<sup>38</sup> 段堅〈教民俗言序〉：「學者主敬以致知格物，知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之理即天地之理，吾身可以參贊者在此。」

<sup>39</sup> 陳祥，〈段容思先生像贊〉，收入王烜，《泉蘭明儒遺文集》，下卷，頁16。



他們的講學，雖開創各地講學之風，<sup>40</sup>卻少能突破地域侷限。例如，張傑之講學，局於鳳翔；段堅之講學，局於蘭州；周蕙之講學，主要在秦州。張傑講學，所依託的是家塾。<sup>41</sup>段堅講學之南村、東園，皆不過一種士大夫優遊之地，<sup>42</sup>與專事講學的書院講堂有別。段堅「益友良朋日往還」一詩，言其晚年南村講學頗盛，<sup>43</sup>然講學記錄《柏軒語錄》卻復散佚。<sup>44</sup>諸儒講學，多沒有書院講堂之類的根據地，實構成此期講學不盛的一個原因。這一講學圈的第三種種特徵是：私淑者在傳播薛瑄之學中所起的作用要強於嫡傳的門人。段堅、周蕙的勇於講學，使私淑一系蔚為大宗，成為關中地區講學的主流。

河東之學構成了關中講學重要的思想資源。它配合著關中之風土人情，賦予關中講學更多的「實踐」性格。這種影響，應當說是深刻的。然而，河東之學主要依賴於私淑者「曲折」地傳入，對於河東之學在關中講學中的地位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後來的歷史證明，由於沒有嫡傳的譜系，河東之學最終在 16 世紀初期完全消融在關中講學之中。之外，也正是沒有嫡傳的譜系，周蕙之後的薛敬之的學術思想表露出重視心體的新傾向，並進一步影響了呂柟。實際上，到 15 世紀末期，河東之學對於關中講學的影響已經內化為思想層面，取而代之推動著講學風氣的進一步發展的，是一種本土資源。這種本土資源給關中講學留下新的思想型遺產，即對於經學以及對機構性遺產(書院)建設的講求。

<sup>40</sup> 〈容思先生年譜序〉：「蘭州後髦如少保(彭澤)及王至善輩十數人，皆勃然興起，並敦古道，至今蘭州士風甲於他邦。」。收入呂柟，《涇野先生文集》，卷8。

<sup>41</sup> 郭定，〈默齋先生祠〉：「不復仕進，肆力於學，弟子從者日眾，乃拓家塾，以五經教授，學者遠近悉至。」。收入《(乾隆)重修鳳翔府志》，卷10。

<sup>42</sup> 〈段容思先生傳〉提到段堅「結廬蘭山之麓，扁曰南村，曰東園」，授徒講業。收入張驥，《關學宗傳》，卷10。

<sup>43</sup> 段堅，〈南村吟〉，收入王烜，《皋蘭明儒遺文集》，下卷，頁8。

<sup>44</sup> 段堅後裔段殿公(心齋、槐庭)道光3年重刻《段容思先生年譜紀略》時言，《柏軒語錄》、《容思文集》稿本因學憲某公按試蘭州，借去分鈔，遂散佚失傳。段堅之詩稿，還有《東園南村吟稿》，參見〈成化十九年癸卯六十五歲條〉，收入彭澤，《段容思先生年譜紀略》。

### 三、本地資源：三原學派之講學(1493-1501)

馮從吾認為關中講學之風創起於段堅。然而，其同鄉長安謝朝宣則歸功於三原學派。謝朝宣在〈弘道書院十詠·弘道堂〉中說：「道在乾坤孰主張，一毫虧處滅天常。橫渠逝矣渾如線，賴有平川建此堂。」<sup>45</sup>他認為，王承裕(1465-1538)<sup>46</sup>的弘道堂，維繫著橫渠以來不絕如縷的道學。也許，從鄉土觀念出發，關中士人似更願意相信明代關中講學之風始於王恕(1416-1508)<sup>47</sup>父子。例如張驥就說：「北都淪陷完顏，代興奉元，一脈不絕如縷，幾同閨位。迨石渠公唱道三原，康僖繼承家學，學風丕變」。<sup>48</sup>那麼，王恕父子講學情形究竟如何？他們給關中講學留下了什麼？

三原學派之講學，始於弘治6年(1493)。該年，王承裕中進士後隨即陪年邁致仕的父親王恕歸鄉，馬理、秦偉遂從其受學。<sup>49</sup>此後，王恕優遊於西園，<sup>50</sup>駐留於亭台園池之間，<sup>51</sup>頗得其趣，亦偶而為王承裕的門徒們講學。然主持講學者為王承裕，故推斷此期講學的下限，應從王承裕入手。王承裕在弘治8年(1495)回京覆命，授職兵科，數月即歸。這是一次短暫的赴京任職，可以忽略不計。那麼，王承裕入京為官的時間，究竟在何時呢？考雷禮《國朝列卿紀》敘其生平，僅自正德年間始：「既歸養，暇授徒於弘道書院。正德間歷授兵刑吏三科給事中」，「八年升太僕寺少卿」，「十一年升本寺卿」。<sup>52</sup>然而，王承裕〈弘道書院仰高門記〉言弘治12年(1499)冬11月，王承裕曾「肅將皇命過故里」。<sup>53</sup>〈玩易軒記〉言弘治15年「兒承裕公差自河南來省余」。<sup>54</sup>據

<sup>45</sup> 《(嘉靖)重修三原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明嘉靖14年刻本)，卷10，頁13。

<sup>46</sup> 王承裕，字天宇，號平川、平川山人、樂林道人，王恕第七子，弘治6年進士，官至南戶部尚書。

<sup>47</sup> 王恕，字宗貫，號介庵，晚號石渠老人、一齒道人，官至吏部尚書。

<sup>48</sup> 張驥，〈關學宗傳·自敘〉，《關學宗傳》。

<sup>49</sup> 張驥，〈馬忠憲公〉，《關學宗傳》，卷18，頁1。

<sup>50</sup> 王恕，〈後樂亭記〉，《王端毅公文集》(明人文集叢刊，影明嘉靖31年刊本)，卷1，頁13。

<sup>51</sup> 西園內有西園草亭、後樂亭、三愛園、涵碧池，參見《(嘉靖)重修三原志》，卷3，頁10。

<sup>52</sup> 雷禮，《國朝列卿紀》(明代傳記叢刊本，台北：明文書局)，卷34，頁502。

<sup>53</sup> 《(嘉靖)重修三原志》，卷12，頁26。

此，則王承裕弘治末年一直在外任官，僅偶而利用公事之便回家省親。然而，弘治 9 年(1496)弘道書院建成時，王承裕親率群弟子講學。也就是說，雖然王承裕曾經於弘治 8 年短暫任職兵科，但其長期駐留於京任京官，可能要在弘治 9 年(1496)之後。弘治 13 年，提學官王雲鳳訪王承裕於弘道書院，也許恰好是王承裕前一年冬天「過故里」之巧遇。因此，王承裕至少在弘治 6 年至弘治 9 年這四年的時間裏，大部分時間用於授徒，而借各種機會探視父親這空閑時間，必定講學於弘道書院中。不過，王承裕的出仕對於三原講學固然有影響，但可能最大的影響是來自門人的散佚。弘治 15 年(1502)，王承裕門人李伸<sup>55</sup>中進士，馬理、秦偉<sup>56</sup>入國子監讀書。應當說，弘治 14 年(1501)可能是三原講學的下限。這一期的講學，留下的資源是：書院講學風氣的重振、經學與理學並重的思想傾向以及馬理為代表的講學人才。

王恕之前，明代關中地區還從未有成功的書院建設。成化末年，王恕始與提學副使婁謙(1466 進士)<sup>57</sup>謀劃興復元代初創的三原學古書院。王恕自述其事道：

三原故有學古書院，在城西北隅。元延佑間義民李子敬暨其弟子懋創為之，延師儒以教鄉之子弟者。……本朝永樂中，居民張秉等即其地建三官廟。成化 23 年(1487)，余致事歸，適提學憲副廣信婁君謙來臨吾邑，課試之餘，訪予於西園精舍，因論四書院故事以及此書院興廢之由。婁君遂令諸生具顛末，下之縣，以議復之。知縣葛璋力不能為，且惑於浮議，不果復。

隨後，王恕被召入京，授吏部尚書。弘治元年(1488)，剛剛提任為陝西按察僉事的婁謙命西安府知府徐政重建學古書院，於是始「撤去三官神像，即

<sup>54</sup> 王恕，〈玩易軒記〉，《王端毅公文集》，卷1。

<sup>55</sup> 李伸，字道甫，三原人，弘治15年(1502)進士，官至四川副使。

<sup>56</sup> 秦偉，字世觀，三原人，弘治18(1505)進士，授戶部主事，遷山西參政，有《西澗詩集》。

<sup>57</sup> 婁謙，字克讓，江西廣信府上饒縣人，官至四川左布政使，督南畿學政時嘗與陳白沙講學於江浦白馬寺。參見焦竑，〈監察御史婁公謙傳〉，《獻征錄》，卷65。

其殿宇奉安孔子及四配像如故，移學古書院碑於內，仍以舊額榜其門」。<sup>58</sup>其工程甚小，僅將原有殿宇撤去道教神像，改祀孔子及儒家信徒。饒是如此，當時仍有「徒復」之譏，可見書院講學風氣之不盛！所以，王恕冀望時任三原知縣馬龍以興起斯文為任，擇師選士，使書院有益於世道，成為士人講學之所。然大體來說，學古書院對於講學的作用並不突出，祭祀功能大於講學功能。<sup>59</sup>建書院以講學，當始於王承裕之弘道書院。

王承裕初於僧舍講學，取名為「學道書堂」。諸生馬理、秦偉、雒昂<sup>60</sup>皆來受學，門徒漸多，遂不能容，乃有書院之建。馬理說：「先生(王承裕)請歸養，有暇，溫故於學道書堂。士多就之，堂至不能容，遂設科於弘道書院，四方從遊者益眾。」<sup>61</sup>這段話表明王承裕講學之盛。稍後任陝西提學僉事的王雲鳳，對弘道書院有更詳細的記載：

弘道書院者，三原王君天宇之所建也。始君舉進士，即侍父太宰公歸。諸生秦偉、馬理、雒昂輩從之學，假僧舍以居，題曰學道書院。君於後堂自構一室，曰弘道書屋。弘治乙卯(1495)，太宰公命如京受職，拜兵垣。數月，復以疾歸。從者益眾。秦偉謀於眾，欲作書院，鋟疏遍告里之富而好禮者、商賈之遊於其地者，鳩緡錢若干，擇地之爽塏，得永清坊之普照廢院。其地以丈計袤四十，廣十二，遂白於官而肇工焉。外為繚垣，門曰仰高，以對南山仰止也。重門曰忝敬。內為小垣三，其門中曰中立。中立門內為弘道堂，後為考經堂，又後為春光亭。<sup>62</sup>

這段話裏透露的信息有：一、王承裕歸初講學於僧舍——學道堂(或稱學道書

<sup>58</sup> 王恕，〈復學古書院記〉，《王端毅公文集》，卷1，頁15。

<sup>59</sup> 據呂柟，〈重修學古書院記〉，《涇野先生文集》，卷14、《(嘉靖)重修三原志》，卷3，正德5、6年，知縣程啟允(字以道，1508進士)重修學古書院，建鄉賢祠、名宦祠於其中。

<sup>60</sup> 雒昂，字仲俛，號三谷，三原人，嘉靖2年(1523)進士，官至河南巡撫，以劾徽藩而受廷杖，斃闕下，有《望洋稿》、《表忠錄》。嘉靖4年(1425)，雒昂巡撫河南，嘗欲刻《王端毅集》，並囑李濂刪擇，參見李濂，〈王端毅公文集序〉。

<sup>61</sup> 馬理，〈南京戶部尚書平川先生王公行實〉，《谿田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明萬曆間刻清乾隆17年補修本)，卷5，頁145。

<sup>62</sup> 王雲鳳，〈弘道書院記〉，《(光緒)三原縣新志》(中國方志叢書，影光緒6年刻本)，卷4，頁15。

院)，並於堂後建弘道書屋。這大約是弘治 6 年至弘治 8 年王承裕的講學之所。二、弘道書院的建設始於弘治 8 年，發起者是秦偉，資金來自商賈士紳的捐助，地點在三原縣永清坊之普照寺舊址。三、弘道書院之名，乃是承續弘道書屋而來，主要建築則有弘道堂、考經堂。其中，弘道堂是書院的核心建築講堂；考經堂則兼具講學、藏書兩大功能。之外，弘道書院內還有王承裕的讀書之所嵯峨山房。後來其門人馬理有講學書院名「嵯峨」者，雖則以山名，來歷卻似亦在此。最後補充一點，弘道書院建成的時間，約在弘治 9 年(1496)。<sup>63</sup>據此，王承裕於弘治 9 年前以學道書堂為講學之所，之後以弘道書院為講學之所。

弘道書院的講學，當時很盛。王恕父子對書院的管理，包括：一、立教條，所謂「自明德、學道、遊藝以及會食、歸寧，咸有矩矱」。二、置辦圖書。王承裕父子嘗「出書數千卷，廚之考經堂」。三、區別生徒，分堂上生徒、堂外生徒、堂下童子、堂外童子四類，「以勤惰修厥而為升降」。四、設定講學時間。諸生「辰至酉歸，執經受業」。弘治 13 年(1500)，王雲鳳慕書院之名往訪，見到是的「冠者數人，童子數十人……進退周旋惟謹」的場面。<sup>64</sup>講學大抵以經學、理學並重，兼及科舉之學。科舉制義文字，是吸引諸生前來問學的關鍵。王恕擅長制義。時人稱其制義善「以機法勝」。<sup>65</sup>然明代以五經取士，故經學實為制義之根本。弘道書院的講學，亦以經學為教。王恕以《易》應科舉，王承裕以《詩》應科舉，故門人多治此二經，<sup>66</sup>王恕說：

吾兒承裕以《詩經》登弘治癸丑進士。是歲吾年七十有八，乞休，得請承裕侍吾歸。既抵家，定省之暇，與從遊之士始得講學於釋氏之剎。近則即前普照院之故址建為弘道書院以居，自名其後堂曰『考經堂』。

<sup>63</sup> 《(雍正)陝西通志》(中國省志彙編，影清雍正13年刊本)，卷27，頁8。

<sup>64</sup> 王雲鳳，〈弘道書院記〉，《(光緒)三原縣新志》，卷4，頁15

<sup>65</sup> 明人言「制義以機法勝者，自王三原先生始」，參見〈知者樂水〉，《王端毅公文集·續文集》，卷2。

<sup>66</sup> 馬理治《春秋》、《詩經》，以《春秋》應科舉；李伸治《詩》；張秉正、張原、黨汝蘭、秦偉、雒昂治《易》；李德明習《禮記》。參見〈弘道書院出身題名記〉，《弘道書院志》(中國歷代書院志，影明弘治18年刻本)。

其意以為從遊之士有治《易經》者，有治《書經》、《詩經》者焉，亦有治《春秋》、《禮記》者焉。<sup>67</sup>

然王氏父子之經學教育，卻負有超科學的意義。這背後有兩點原因，一則取決於王恕對經學的態度，二則取決於王恕、王承裕父子治經時「由經學入理學」之趨向。

王恕固非怙守一經的陋儒。焦竑說：「王端毅公群經無不涉獵，尤熟於《書》、《詩》。」<sup>68</sup>他命嗣子王承祜習《書》，<sup>69</sup>幼子王承裕習《詩》，體現出不願為科第而數世怙守一經的積極態度。王恕對於經學的態度，歸結起來是「重經、疑傳、以心證經傳之失」。他曾說：「考經者固不可不用傳注，亦不可盡信傳注，要當以心考之也。」<sup>70</sup>王恕 84 歲時刊行《石渠意見》，質疑程朱對五經、四書的一些注釋；91 歲時刊行《玩易意見》，「依文尋義，間有不愜於心者，乃敢以己意言之」，而於程伊川《易傳》、朱熹《周易本義》多有發明。<sup>71</sup>這一點在明初學界是很可貴的。約略同時的著名學者胡居仁，即主張全信程朱之說，以為「四書六經之言，廣大浩博精密，後世無人理會得，至程朱方理會得。今因程朱之書，以理會四書五經，如指諸掌」。<sup>72</sup>對比之下，王恕解經的勇氣頗值得稱道。清儒吳焯雖對王恕以臆見解經表示遺憾，卻也肯定王恕在經學中敢於破除迷信的勇氣：「明自永樂《大全》出後，甚至棄去程《傳》而專用《本義》，康僖(此處吳焯誤，應為端毅)不為習俗所靡，且欲擴充傳義之外，要不失為慕古深思之士。惜乎未能博覽儒先經說，徒以臆見斷之耳。」<sup>73</sup>王恕的經學，雖不迷信程朱，卻亦非遠溯漢儒考據，而純以心

<sup>67</sup> 王恕，〈考經堂記〉，《王端毅公文集》，卷1，頁11。

<sup>68</sup> 焦竑，《玉堂叢語》(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81)，卷1，頁23。

<sup>69</sup> 王恕，〈書承祜誥命碑下方〉，《王端毅公文集》，卷5，頁11。

<sup>70</sup> 王恕，〈考經堂記〉，《王端毅公文集》，卷1，頁11。

<sup>71</sup> 王恕，〈玩易意見序〉，《玩易意見》(續修四庫全書影明正德元年刻本)。

<sup>72</sup> 胡居仁，《居業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3。

<sup>73</sup> 吳焯，《繡穀亭熏習錄》(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537。四庫館臣的評價對王恕的評價則偏於貶責。《四庫全書總目》卷34石渠意見4卷拾遺2卷補闕2卷條：「間有發明可取者，而語無考證，純以臆測，武斷之處尤多。」卷7玩易意見2卷條：「其說頗自出新意，然于文義有不可通者，輒疑經文有偽，殊不可訓。」清人李慈銘至以為清代阮伯元之學術

臆度。這在明代經學中是有代表性的。王恕之經學，對於弘道書院的諸生有一定影響。弘治 12 年，王恕曾經在弘道書院裏宣講過《石渠意見》。<sup>74</sup>在家學薰陶下，王承裕亦頗重視讀經。王承裕的經史之學，儘管在清代考據學者看來不足稱道，<sup>75</sup>但他對弘道書院諸生「博觀五經」、「各治一經，餘四經亦當次第而觀」的要求，<sup>76</sup>卻對後來馬理等人影響深遠。

然而，弘道書院之講學，考經之餘，要在弘道。謝朝宣有詩言：「弘開絳帳來群英，經傳而今須講明。要作忠臣救朱子，豈徒稽古較桓榮。」<sup>77</sup>後兩句，是說弘道書院的講學並不侷限於字詞的訓詁、考據，而是要做朱熹的忠臣，宣講朱子學。馬理就說：「先生(王承裕)教以宗程朱為階梯，祖孔顏以為標準。」<sup>78</sup>王恕父子對於性理之學皆有一定造詣，而於「心」頗為重視。在其經學著作《石渠意見》中，王恕大談性理：「一即心之理也。心為神明之舍，虛靈不昧，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sup>79</sup>又曾經做過一篇《心箴》，大談「心」之功用：「吾心具天命之性，為神明之舍，含動靜之機，知古今之事，作五官之主，為應酬之本，持變通之權，蓄治安之計，契聖賢立言之意，遵當仁不讓之訓，辨諸儒傳注之非，釋後學積年之惑，存扶世立教之志。」<sup>80</sup>然綜觀王恕，其對理學的思考似不及對經學的興趣，而經學的成就遠遜於其經濟之功，故黃宗羲說：「先生之學，大抵推之事為之際，以得其心安者，故

「與王石渠父子最近，故訓詁名通，而專以聲聞辨文義，時亦失之偏謫。」參見張舜徽，《清人筆記條辨》(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359。

<sup>74</sup> 王恕，〈石渠意見請問可否書〉：「致仕回家，復理舊學，其於傳注發揮明白、人所易知易行者，不敢重復演繹，徒為無益之虛文。至於頗有疑滯再三體認行不去者，乃敢以己意推之。與諸生言之，評論其可否。」。收入《石渠意見》(續修四庫全書，影南京圖書館藏正德刻本)，頁573。

<sup>75</sup> 〈李衛公通纂四卷條〉：「絕無辨證，可知其(王承裕)考訂之疏。」。收入《四庫全書總目》，卷60。

<sup>76</sup> 王承裕，〈弘道書院學規〉，《弘道書院志》，頁1。

<sup>77</sup> 謝朝宣，〈弘道書院十詠·考經堂〉，《(嘉靖)重修三原縣志》，卷9，頁13。

<sup>78</sup> 馬理，〈南京戶部尚書平川先生王公行實〉，《谿田文集》，卷5，頁145。

<sup>79</sup> 王恕，《石渠意見》，卷2，頁4。

<sup>80</sup> 王恕，〈心箴〉，《王端毅公文集》，卷3，頁10。

隨地可以自見。至於大本之所在，或未之及也。」<sup>81</sup>話說得委婉，實是批評王恕未能見得本體，未能見得道。比較而言，王承裕的理學成績則要突出一些。成化 20 年(1484)，20 歲的王承裕作〈太極肇判〉：「乾坤攸位，乃旋乃轉，陰陽生焉。由是生生化化，萬物咸備而人生於中，得元亨利貞之理，為仁義禮智之性。理也者，默默然無形可見，無聲可聞，然賦之於人，非動乎其未賦之先，蓋靜之謂也。人之有性，猶天地之有理。未感而見之於外，徒深以存之於內，則失其變化之機矣。」<sup>82</sup>據馬理說，王陽明還曾經向王承裕請教《大學》、《中庸》之要。王承裕另著有《論語近說》、《論語蒙讀》、《動靜圖說》、《草堂語錄》，表現出與其父迥異的理學家的氣象。然王承裕與其父又有相似之處，王承裕亦非常重視「心」的作用。他在〈進修筆錄〉中說：「心正則身正，身正則萬事皆正矣，是故正萬事莫如正身，正身又莫如正心也」，「人之一身，惟心為主，心正則身正，心不正則身亦不正矣。」<sup>83</sup>講學時，王承裕要求諸生「有志性理之學者，讀《性理大全》、《近思錄》，沈潛玩味，求自得之」。<sup>84</sup>或許，「弘道」的本意，就是要宣講理學的。王雲鳳說：「嗟乎！作書院而以弘道名者，學者亦有惕然於中者乎！……學者求道為笑，一遇規行矩步端顏正色之士，則議論紛起，誹謗橫生，遂使學以講道為諱。」<sup>85</sup>這似是當時對於「道學」的俗態的概括。弘道書院宣講性理之學，則適足以破此俗態。大體來說，王恕之學，訓誥的成份多一些；<sup>86</sup>王承裕之學，性理的成份多一些。故自王恕至王承裕，實乃一經學折而入於理學之過程。自其大環境看，理學的研究氣氛漸濃，而弘道書院的講學則進一步推進關中地區探

<sup>81</sup> 黃宗義，《明儒學案》，卷9，頁175。

<sup>82</sup> 馬理，〈南京戶部尚書平川先生王公行實〉，《谿田文集》，卷5，頁145。按〈太極肇判〉，《(光緒)三原縣新志》，卷6，與馬理所錄文字略異。

<sup>83</sup> 〈進修筆錄〉，《(光緒)三原縣新志》，卷6，頁8。

<sup>84</sup> 王承裕，〈弘道書院學規〉，《弘道書院志》，頁1。

<sup>85</sup> 王雲鳳，〈三原弘道書院記〉，《(嘉靖)陝西通志》，卷32，頁27。

<sup>86</sup> 馮從吾知道王承裕之學源出王恕。馮從吾，〈答李翼軒老師〉：「承諭康僖公學問實其父端毅公成之。《石渠意見》有禪經學。」收入《少墟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5。據此，當時大約有人提醒馮從吾是否應當將王恕列入《關學編》。然而，《關學編》終究只收王承裕，而不收王恕，原因大概即是以為王恕疏於理學。



討性理的氣氛。

弘道書院講學之業績，還在作養人才一節。書院的規條甚嚴，要求諸生宿歇於書院，5日一假，每假半天，每月初2日、16日考試，平日尚有夜課。正因為此，書院造就人才甚多。馬理、秦偉、李仲、張原(1473-1524)、<sup>87</sup>雒昂等人，後來皆有學名。馬理的經學，當時即受提學官楊一清的激賞，<sup>88</sup>溯其源，則未必非拜王恕父子之賜。秦偉、馬理等人皆與呂柟講學，是關中講學高潮的代表人物。馬理之於三原學派，猶如周蕙之於河東學派。正是通過馬理，以王承裕為代表的三原學派融進了關中講學大流之中。

總之，三原學派之講學，作為支流匯入淵源於河東學派的關中理學發展潮流中，為關中理學提供新的思想資源。《四庫全書總目》卷96願學編二卷條說：「關中之學，大抵源出河東、三原。」清人柏景偉說：「段容思起於皋蘭，呂涇野振於高陵，先生王平川、韓苑洛，其學又微別。」<sup>89</sup>「其學微別」，正是新思想注入之意，故黃宗羲有「三原別派」之定義，<sup>90</sup>而《四庫全書總目》有「三原支派」之論。<sup>91</sup>王恕父子以經學為號召，卻又不侷限於經典，而是突破經學注疏、訓詁的限制，進一步體認性理之學，達成弘道之目的。因此，三原學派對於後來關中講學的影響，核心在於對經學的重視與講求。弘道書院的建成，則為關中講學提供了新的物質性資源，同時也開創了書院講學之風氣。之外，需要補充一點的是，王恕父子的講學，崇尚氣節，不為空談。這一點對於此後關中講學人士的影響可能也是存在的。馬理、張原、雒昂，皆曾抗節而遭廷杖。概括地說，弘道書院講學對關中講學的貢獻有三

<sup>87</sup> 張原，字士元，三原人，正德甲戌進士。為官慷慨敢言，如〈玉坡奏議五卷條〉，《四庫全書總目》，卷55所言，當時同年趙漢即有「老竹冰霜見一竿」之喻。嘉靖3年(1524)7月以諫大禮議在左順門哭諫事件中被杖斃，著有《黃花集》、《蛩鳴集》、《玉坡奏議》五卷。

<sup>88</sup> 楊一清督關中學政，見馬理、呂柟、康海文而有慨：「康生之文章，馬生、呂生之經學，皆天下士也。」

<sup>89</sup> 柏景偉，〈小識〉，《關學編》，頁69。

<sup>90</sup> 黃宗羲，〈三原學案〉，《明儒學案》，卷9，頁172。

<sup>91</sup> 〈關學編五卷條〉：「明世關西講學，其初皆本于薛瑄。王恕又別立一宗，學者稱為三原支派。大抵墨守主敬窮理之說，而崇尚氣節，不為空談。」收入《四庫全書總目》，卷63。

點：開書院講學之風氣，倡經學理學並重之學術，育理學講學之人才。之後，書院講學之風，在關中地區的提學官的推動下，愈發強勁。有意思的是，15世紀末期著名的陝西提學官楊一清，也是由王恕擇任的。

#### 四、官方資源：提學官與書院建設(1492-1507)

對於一個地方的學術風氣，提學官往往具有極大的影響。明儒馬自強(1553年進士)<sup>92</sup>說：「學校之模範在師儒，師儒之表率在督學。」<sup>93</sup>康海也說：「提學之官，凡所在皆宗師之也。」<sup>94</sup>提學官一職，始設於正統元年(1436)。薛瑄即是第一批提學官中的一員，時任山東提學。此後，提學官一度於景泰元年(1450)罷設，而於天順6年(1462)復設。<sup>95</sup>德國學者蒂爾曼·格裏姆在其論明代提學官一文中說，1462年以後的提學官「更關注理學，也許體現了薛瑄——曾在1436年任提學官並在此時對大學士李賢有重大影響的學者——的影響」，而提學官也「最終參加到書院的活動中去，或常常自己創建書院」。<sup>96</sup>在蒂爾曼·格裏姆看來，也許「關注理學」與「創建書院」是密切相關的事情。這裡面包含著一個非常有趣的事實，即無論明代地方官員創建書院懷著什麼樣的真實目的，最後在明代講學盛行的風潮中卻多半會成為理學發展的平臺。那麼，關中地區提學官的聲譽如何？對於關中地區的講學運動起著什麼

<sup>92</sup> 馬自強，字體幹，別號幹庵，同州人，嘉靖32年(1553)進士，仕至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sup>93</sup> 馬自強，〈正士風策〉，《馬文莊公文集選》(清同治庚午敦倫堂刊本)，卷11，頁20。

<sup>94</sup> 康海，〈送李先生序〉，《康對山先生集》(續修四庫全書，影明萬曆10年潘允哲刻本)，卷29，頁18。

<sup>95</sup> 明代提學官之設，始於正統元年5月。除兩京以御史督學外，十三省皆以按察司僉事、副使為提學官。《明會典》，卷78載：「正統元年，奏准各處添設按察司副使或僉事一員，南北直隸監察御史各一員，請敕專一提督學校。」《明史·選舉志一》亦云：「生員入學，初由巡按御史、布按兩司及府州縣官。正統元年始特置提學官，專使提督學政，南北直隸俱御史，各省參用副使僉事。」按，提督學校一職，雖此前亦有設置，但非常制。王世貞，〈皇明異典述四附馬提學條〉：「洪武十九年，敕駙馬都尉梅殷提督山東學校，兼理地方事務。」。收入《弇山堂別集》(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85)，卷9。

<sup>96</sup> Tilemann Grimm, "Education Intendants," in Charles O. Hucker, eds. *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 Seven Stud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134,143.

樣的作用？據 16 世紀初期關中著名文人康海說，歷任的數十位關中地區提學官中，「為諸生仰慕而樂道者，才數人爾也」。<sup>97</sup>然而，對於關中講學，成化以來的關中提學官還起著積極的作用。在呂柟、馬理等著名講學者興起之前，楊一清(1454-1530)<sup>98</sup>與王雲鳳(1465-1517)<sup>99</sup>是關中地區最熱心於書院建設及講學的兩位提學官。

楊一清之前，關中地區的提學官們已經著手過書院的建設。婁謙受王恕之鼓動，於弘治元年命地方官重建三原縣學古書院，即為一例。據說，婁謙及他的前任戴珊(1437-1505)<sup>100</sup>都曾試圖復建正學書院而沒有成功。<sup>101</sup>顯然，在講學風氣未開之前，興復書院似乎要承受太多的浮議。然而，弘治 9 年(1496)楊一清興復正學書院，恰與王承裕的弘道書院的建設同時，說明在 15 世紀末年關中地區的講學風氣處於上升的階段。因此，楊一清重建正學書院，既是講學風氣已開的結果，亦反過來進一步促進講學風氣的發達。弘治 5 年，楊一清在吏部尚書王恕的推薦下，出任陝西提學僉事。<sup>102</sup>數年後，楊一清重建正學書院。正學書院始建於元朝，本為北宋時「橫渠張子倡道之地」，後來元儒許衡亦講學於此，於是省臣遂創建書院，祀張載、許衡二人。至明初，

<sup>97</sup> 康海，〈送李先生序〉，《康對山先生集》，卷29，頁18。

<sup>98</sup> 楊一清，字應寧，號蓮庵、石淙，安寧人，成化8年(1472)進士，官至內閣大學士。按，楊一清為明中期神童，12歲即博通群籍，儲養于翰林院中。石淙之號，取自雲南地名。崔銑，〈石淙對〉：「客問曰：『太宰楊公取滇之石淙以名江南之居，古歟？』」收入《洹詞》(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1。費宏，〈石淙辭〉：「石淙在滇南，今太宰蓮庵楊公先世所居之地也。公自滇南徙巴陵，再徙丹徒，其藏修之所，皆扁曰石淙，以示不忘。」收入《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卷1，頁27。

<sup>99</sup> 王雲鳳，字應韶，號虎谷，山西遼州和順縣人，與王瓊、喬宇號河東三傑，成化20年(1484)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虎谷之號，殆亦源出於王雲鳳家鄉地名。王雲鳳，《博趣齋稿》(續修四庫全書，影明刻本)，卷2、卷7有〈宿虎谷〉、〈虎谷〉、〈虎谷野步〉、〈虎谷十八詠〉諸詩。

<sup>100</sup> 戴珊，字廷珍，號松厓，江西浮梁人，天順8年(1464)進士，官至左都御史，卒於官。韓邦奇《苑洛先生語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明嘉靖白璧刻本)，卷6，頁6記載，陝西提學官中有名「戴山」者，「成化中提學陝西，諸生至今誦慕」。「戴山」殆「戴珊」之誤。

<sup>101</sup> 《(嘉慶)長安縣誌》(中國方志叢書影清嘉慶17年修民國25年重印本)，卷17，頁3。

<sup>102</sup> 王恕，〈贈陝西提學憲副楊公升太常少卿序〉：「余適典選，素聞公(楊一清)名，且知其行檢，於是舉授本省提學。」收入《王端毅公文集》，卷2。

書院舊址爲兵民所據。楊一清以爲，西安府作爲省城，乃「衣冠萃止，典型式昭」之所，不可無書院。<sup>103</sup>弘治9年，楊一清利用秦王府的隙地，修建正學祠，遂重建正學書院。<sup>104</sup>重建後的書院分爲三區：中間爲祀奉二程、張載、許衡的正學祠；左邊爲提學分司；右邊爲書院。<sup>105</sup>將提學分司建在書院之內，說明楊一清對於書院講學的重視，也方便了楊一清對於正學書院講學的督促。他將各地極有才華的諸生們，選入正學書院肄業，其中便包括李夢陽(1472-1529)<sup>106</sup>、康海(1475-1540)<sup>107</sup>、呂柟、馬理等人。之外，各府縣學校的圖書，也被楊一清收羅到書院之中。<sup>108</sup>楊一清躬自教授。馬理說：

(楊一清)提學時，善於其職。士有博記誦者，有修文辭者，有攻舉業者，有志道德者。……以朱子《白鹿洞規》及程、董《學則》誨諸可以語上之士，又拔諸髦士於貢院，繼於正學書院，躬授經傳，使轉相傳授，故遐方之士咸如親炙。<sup>109</sup>

當時諸生所習，舉業、文辭之外，還包括理學。嘉靖元年陝西提學副使唐龍在追述其事時就說：「弘治中，邃庵先生以提學至，爰窮爰度，乃移置焉。以道設科，分經建局，於是乎彬彬弟乎〔子〕員復知有魯齋之學矣。上之知有橫渠與二程之學矣，又上之知有孔氏、孟氏之學矣。」<sup>110</sup>

正學書院的建成，對於關中講學的發展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培養了大批

<sup>103</sup> 唐龍，〈正學書院續記〉，《漁石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明嘉靖刻本)，卷1，頁17。

<sup>104</sup> 《(雍正)陝西通志》，卷27，頁4；卷28，頁16。

<sup>105</sup> 李東陽，〈正學書院記〉，《(嘉慶)咸寧縣志》(中國方志叢書，影清嘉慶24年修民國25年重印本)，卷13，頁11。

<sup>106</sup> 李夢陽，字天賜，又字獻吉，號空同子，慶陽人，徙河南扶溝，弘治6年(1493)進士，官至江西提學副使。工詩古文，與何景明等號弘治十才子，為提倡文學復古運動的「前七子」領袖，著有《空同集》。

<sup>107</sup> 康海，字德涵，號對山，又號濟西山人、涇東漁父、太白山人，武功人，弘治15年(1502)進士第一，後因救李夢陽而求於劉瑾，遂坐瑾黨落職。康海，〈懷遠將軍西安右護衛指揮使陳公淑人曹氏合葬墓誌銘〉：「予為諸生時，邃庵先生提學關內，以予就業正學書院。」收入《康對山先生文集》，卷41，頁6。

<sup>108</sup> 王雲鳳，〈正學書院藏書記〉，《博趣齋稿》，卷14，頁187。

<sup>109</sup> 《(嘉靖)陝西通志》，卷19，頁1。

<sup>110</sup> 唐龍，〈正學書院志序〉，《漁石集》，卷2，頁14。

人才，<sup>111</sup>並成爲此後 80 年間關中地區最著名的講學書院。歷任提學官，包括弘治年間的王雲鳳、正德年間的何景明(1483-1521)<sup>112</sup>、嘉靖年間的唐龍(1477-1546)<sup>113</sup>，以及萬曆年間的許孚遠，都對正學書院進行過修繕或者講學於其中。甚至，離開提學之職改任總制三邊軍務的楊一清，仍然不能忘情於正學書院，親自赴謁書院或者關注書院建設。<sup>114</sup>王雲鳳、許孚遠後文另敘。何景明於正德 13 年(1518)任陝西提學副使，此後 4 年間嘗講學於正學書院。<sup>115</sup>唐龍修葺正學書院，講學其中，且編纂《正學書院志》。<sup>116</sup>由此可見，楊一清建成正學書院，對於關中講學的意義非常之大。此外，楊一清還在鳳翔府隴州、西安府武功縣分別創建岍山書院、綠野書院。岍山書院建於弘治甲辰，楊一清參與其事。<sup>117</sup>弘治 8 年，楊一清還命鄠縣知縣房嵩撤文昌舊祠改建明道祠。<sup>118</sup>

<sup>111</sup> 王雲鳳，〈正學書院進士舉人題名記〉：「三曆取士之科，舉於鄉者八十一人，舉進士者十人。鄉舉皆得解元，而進士得狀元一人。……書院未十載，所得如此，亦盛矣！」收入《博趣齋稿》，卷14，頁187。

<sup>112</sup> 何景明，字仲默，號大復，河南汝寧府信陽州人，弘治15年(1502)進士。其詩文與李夢陽齊名，有「何、李」之稱，與李夢陽、邊貢、徐禎卿並稱四傑。

<sup>113</sup> 唐龍，字虞佐，號漁石、夢漁子，浙江金華府蘭谿縣人，正德3年(1508)進士，官至吏部尚書。他是章懋(1437-1522)的門人、鄭琦的外孫，故擅長《易》學，亦精於詩文，嘉靖元年(1521)始任陝西提學。參見唐龍，〈月塢疾人問答〉，《漁石集》，卷3、《四庫全書總目》，卷7，〈易經大旨四卷條〉、卷176，〈漁石集四卷條〉、吳焯，〈易經大旨四卷條〉，《續穀亭熏習錄》。章懋，字德懋，號閭然子，晚號穀濱遺老，蘭谿人，成化2年(1466)進士，官至南京國子臨祭酒，晚年講學於楓木山中，學者稱楓山先生，有《楓山語錄》、《楓山集》。鄭錡，初字湘之，改字威甫，號聽庵，蘭谿人，成化11年(1475)進士，曾官靖江知縣。

<sup>114</sup> 王雲鳳，〈雙鶴前導〉：「邃庵楊公謁正學祠，因過書院。」收入《博趣齋稿》，卷10，頁175。又〈正學書院藏書記〉：「乃鳩粟，且請公(楊一清)成初志，得白金統易書若干卷。」收入《博趣齋稿》，卷14，頁187。

<sup>115</sup> 康海，〈何仲默集序〉：「(正德)十三年，仲默以提學來關中，數以公事過予。」收入《康對山先生文集》，卷28，頁3。又〈送太復先生還信陽序〉：「太復先生居關中四年矣，今年夏六月以疾求去。……其官屬及諸生之在正學書院者，不欲遽別于先生。……(何景明講學)，先之以身而董之以實，行之以嚴，推之以恕。其初也疑而弗信，畏而弗親，而其中也，幡然而悟，沛然而從。」收入《康對山先生文集》，卷33，頁9。

<sup>116</sup> 〈學校〉：「嘉靖中唐龍督學時，士學趨詭異，乃新正學書院，選士群肄之。」收入《(雍正)陝西通志》，卷27。

<sup>117</sup> 〈崇經閣記〉：「院肇於弘治甲辰春三月，閣成於戊午(1498)秋七月。倡其事者，……按察副使楊君一清。」收入《(乾隆)重修鳳翔府志》，卷10。然弘治年間無「甲辰」，疑為丙辰(1496)。

<sup>118</sup> 王鏊，〈鄠縣明道先生廟碑〉，《(康熙)鄠縣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影康熙刻本)，卷12，

綠野書院則本為宋代張載講學之地綠野亭。弘治 9 年(1496)，<sup>119</sup>楊一清命武功縣知縣建張載祠堂，其後建講堂、學舍。書院建成後，楊一清「擇士子充於中，以訓導趙文傑為之師，<sup>120</sup>俾日講性理之學。凡縣學諸生則三日一至聽講。其規約大率與白鹿雒陽類。時西安、鳳翔諸生聞風踵至」。楊一清督學之暇，「時坐堂上督勸之，颯颯乎道學之流行也」。看來，楊一清的書院講學，所欲振作的非僅是科第，亦關注性理之學。吳寬說：「楊君應寧由近臣出領學政，公勤善教，士子經指授者輒取科第。君曰：『此非所以教學者也。』」<sup>121</sup>楊一清心目中「所以教學者」，應當是有異於科舉之學的理學與經學。整整 7 年，楊一清先後任提學僉事、提學副使，亦如王恕所言，「始終一節，略不少渝」。蒂爾曼·格裏姆說：「楊一清後來被視作明代歷史上最傑出的提學官。」<sup>122</sup>這在當時的地方志記載中亦可得到驗證。嘉靖《陝西通志》言：「當其時，雖宗室不能奪生員之婚，雖撫按縉紳不能撓課試之權，為國朝提學之最。」<sup>123</sup>

在楊一清之後，繼任提學官是王雲鳳。弘治 12 年(1499)，王雲鳳出任陝西提學僉事。弘治 14 年(1401)王雲鳳升為按察副使，整治洮河岷州邊備。<sup>124</sup>為此，楊一清向朝廷上疏，請求將王雲鳳仍置於提學道，以獎彰學術：「訪得代臣提學陝西按察司僉事王雲鳳，志向高古，行履端方。……今之人才如王雲鳳者，蓋不多得。……乞敕吏部，再行訪察，合無將王雲鳳改任提學，別推相應官員整飭兵備。」<sup>125</sup>於是，弘治 17 年(1504)至正德 2 年(1507)，王雲鳳復任提學副使。王雲鳳的品行，以其後來依附劉瑾而頗有可議之處。《續修四庫全書提要》對王雲鳳有一評價，極精到：

文苑考。

<sup>119</sup> 〈祠祀志〉，《(雍正)武功縣後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影清雍正11年刻本)，卷1作「弘治八年」。

<sup>120</sup> 趙文傑，字士英，四川內江人，其教諭武功時，康海為諸生。

<sup>121</sup> 吳寬，〈綠野書院碑記〉，《(正德)武功縣志》(乾隆26年刊本)，卷1，頁6。

<sup>122</sup> Tilemann Grimm, "Education Intendants", p.144.

<sup>123</sup> 《(嘉靖)陝西通志》，卷19，頁1。

<sup>124</sup> 呂柟，〈虎谷先生王公墓誌銘〉，《涇野先生文集》，卷24，頁22。

<sup>125</sup> 楊一清，《楊一清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2，頁46。

雲鳳以邀權奸劉瑾寵，起為國子監祭酒，嘗請瑾監太學，如魚朝恩故事，復請校刻瑾近行法例，永俾遵守。晚節不勁，其行誼本無足稱。乃弘正間與喬宇、王瓊並稱河東三鳳，文采風流，尚在晉溪、白岩之上。所謂孔雀有毒，文采斐然，其論也。<sup>126</sup>

雖然依附醜名昭著的劉瑾而得到國子監祭酒的位置，但是王雲鳳的學問、文采、書法還是得到當時及後人肯定的。稍後的一位學者崔銑對王雲鳳晚節不保也表示遺憾。<sup>127</sup>然而，當王雲鳳督學關中時，其學問人品都堪稱一流。他的學問，源於薛瑄。<sup>128</sup>門人韓邦奇稱其理學造詣說：「國朝理學稱文清一人。文清之後，虎谷一人。」<sup>129</sup>王雲鳳邃於性理之學，且熱衷於講學。呂柟曾回憶說：「某年十七八時，先生提學陝西，深受其開喻獎拔之益。凡先生之言語動靜，恒以為師模，而一時西土士風，亦駸駸乎復古矣。」<sup>130</sup>對於當時的王雲鳳的講學，呂柟以為「雖使思孟設科，無以過之」，<sup>131</sup>評價極高。像其前任楊一清那樣，王雲鳳將主要的精力投放在正學書院。他建正學書院藏書樓，廣收書籍，以資諸生誦覽，<sup>132</sup>並在正學書院開設求道、讀書、學文、治事「四科」，督促諸生講學。他的講學，不拘於科舉，「教人讀書自《小學》、《近思錄》始，次及各經史。語學者以聖賢之道」。他要求學者「立志以堅趨向之方，主敬以養清明之氣，讀書以究事物之理，慎行以致踐履之實」。<sup>133</sup>立志、主敬、讀書、踐履，都是薛瑄之學的要點。王雲鳳對於學生的要求，顯

<sup>126</sup> 〈博趣齋稿二十三卷條〉，《續修四庫全書提要》（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2），集71。

<sup>127</sup> 崔銑，〈松窗寤言〉：「王虎谷雲鳳之節介，豈非強哉。已乃甘張彩之臨，受劉瑾之包，與瑾嬖人孫聰交，不終矣。」收入《洄詞·附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明嘉靖33年周鏞等池州刻本），卷2，頁28。

<sup>128</sup> 唐龍，〈少司馬塗水先生傳〉：「夫自薛文清倡道河汾，先生與和順王公雲鳳並宗其學。」收入寇天敏，《塗水先生集·附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明嘉靖寇陽刻本），卷6，頁1。

<sup>129</sup> 辛全，〈王雲鳳條〉，《理學名臣錄》，卷5，頁1。

<sup>130</sup> 呂柟，〈刻博趣齋稿序〉，《涇野先生文集》，卷11，頁19。

<sup>131</sup> 呂柟，〈虎穀先生王公墓誌銘〉，《涇野先生文集》，卷24，頁22。

<sup>132</sup> 「弘治中提學王雲鳳建書樓於正學書院，廣收書籍以資諸生誦覽。」收入《（雍正）陝西通志》，卷27。王雲鳳，〈正學書院藏書記〉：「雲鳳繼至，益以石刻五經等書。」收入《博趣齋稿》，卷14，頁187。

<sup>133</sup> 呂柟，〈虎穀先生王公墓誌銘〉，頁22。

然是以薛氏之學為標的。為了宣講理學，王雲鳳還邀請當地學者劉璣至正學書院講學。劉璣是周蕙門人李錦的門人，可算是周蕙的再傳，而李錦入祀正學書院也正是在王雲鳳的主持之下。<sup>134</sup>後人說，當時「虎谷王先生督學陝西，倡明道學，敦延(劉璣)先生居正學書院，講論性理，三秦學士翕然宗之」。<sup>135</sup>這算是薛瑄直系門人與私淑系統之間的又一次密切接觸和合作，且是官方資源與本地資源的一種合流。在王雲鳳的門人中，著名的有呂柟、韓邦奇。韓邦奇的門人楊爵，是關中地區 16 世紀的三、四十年代最著名的講學者。楊爵的後人楊紹武說：「先人(楊爵)所師苑洛先生，原出王虎谷先生之門，則關學與晉學淵源可歷歷考也。」<sup>136</sup>因此，王雲鳳之督學關中，一方面推進正學書院的建設，並用自己的行動鼓勵、培植了關中講學的風氣；另一方面，王雲鳳作為薛瑄門人及提學官的雙重身份，進一步加強了河津之學在關中地區的影響。

總之，以婁謙、楊一清、王雲鳳為代表的提學官群體，創建書院，與諸生講學，主觀上是要增加諸生應試的能力，客觀上卻也刺激了關中地區的講學活動的發展。提學官給關中講學帶來的資源是：官方對於書院的支持與投入、宦遊者帶來的思想。之外，提學官對於學子的提攜，為稍後的嘉靖年間的關中講學培養了不少的講學人才，如呂柟與馬理。或許，由於提學官在早期關中講學中的影響，關中地區的理學教育與科舉教育之間從來就不矛盾。這後來成為關中講學的一個重要特點。

## 五、三系融合：呂柟、馬理之講學(1498-1555)

16 世紀前期的明代中國，人才極盛，所謂「弘、正間鉅儒輩出」。<sup>137</sup>這段時間同樣是關中地區人才最盛的時期。復古派之詩文、呂柟之理學，皆具

<sup>134</sup> 王雲鳳，〈正學祠增祀李介庵先生告文〉，《博趣齋稿》，卷18，頁209。

<sup>135</sup> 許宗魯，〈資政大夫戶部尚書近山劉公璣墓誌〉，收入焦竑，《獻征錄》，卷29，頁9。

<sup>136</sup> 楊紹武，〈理學備考序〉，《理學備考》。

<sup>137</sup> 耿定向，〈題涇野先生語錄〉，《涇野子內篇·附錄》(北京：中華書局，1992)。



全國性之影響。然而，康海、呂柟、馬理等人的崛起，正是 15 世紀後半期關中講學的結果。楊一清督學關中時，曾感慨說：「康生之文章，馬生、呂生之經學，皆天下士也。」既而，他將數人悉數選入正學書院肄業。對於提學官王雲鳳，呂柟則自居弟子，言必稱師。<sup>138</sup>之外，呂柟還通過問學於薛敬之，上接薛瑄一脈。<sup>139</sup>馬理(1474-1555)既稟其家學，<sup>140</sup>復遊學於王恕父子。<sup>141</sup>因此，以呂柟、馬理為代表的關中講學活動，可以說是三種講學力量交融的產物，既體現了對 15 世紀中期以來河東學派在關中的傳承以及對三原學派講學的延續，也代表著提學官倡行講學之成績，是整合外來思想資源、本地資源、官方資源的基礎後的一次高潮。

呂柟(1479-1542)<sup>142</sup>講學，始於雲槐精舍。雲槐精舍在高陵縣城距河門外之後土宮，以雲槐樹而得名。<sup>143</sup>呂柟〈雲槐精舍記〉云：「邑郊東後土宮槐樹匝

<sup>138</sup> 呂柟，〈答王虎谷先生書〉，《涇野先生文集》，卷20：「風聞吾師與寇塗水結婚。」同卷〈復喬冢宰先生書〉：「若虎谷先生志銘，不足以盡弟子追慕之情，且人微言輕，亦不足以為虎谷先生之重。若吾執事所撰神道碑出，世方知有虎谷先生，而虎谷先生亦含笑地下。此固吾弟子日夜拳拳所屬望者。」

<sup>139</sup> 弘治11年(1498)，薛敬之自金華府同知致仕歸居，偶因事至長安。呂柟在開元寺首見薛敬之，此後凡四見，參見〈思庵先生薛公墓誌銘〉，《涇野先生文集》，卷22。按，呂柟早年選師從於鄉人周尚禮、孫昂。周尚禮字組之，號浩軒，以貢任垣曲縣丞，未仕。孫昂，字廷舉，弘治15年進士，參見呂柟纂修，《(嘉靖)高陵縣志》(中國方志叢書，影明嘉靖20年刊本)，卷6，頁7，〈周先生條〉、頁9，〈孫先生條〉。

<sup>140</sup> 馬理，字伯循，號谿田，三原人。馬理的祖父馬貴(1394-1443)，字尚賓，號靖川，精《中庸》，有《中庸講義》一卷、《靖川語錄》一卷。其父馬江，字文淵，克承父業，學者稱「雲岩先生」。兩代皆以教授為業。參見張驥，〈尚賓先生條〉，《關學宗傳》，卷10、康海，〈光訓堂記〉，《康對山先生集》，卷25。按，馬理又號西玄，朱國禎，〈呂霍意見條〉：「馬西玄為呂(柟)作墓誌。」收入《湧幢小品》(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3。

<sup>141</sup> 馬理，〈平野遺思卷序〉：「游平川先生(王承裕)之門。」收入《谿田文集》，卷2。〈馬理傳〉：「得其(王恕)指授。」收入《明史》，卷282。然而，張舜典，《雞山語要·明德集》，論馬理：「弱冠崇理學，平川(王承裕)稱畏友」收入《雞山語要·明德集》，頁30。據張驥，〈鍾仲俊先生條〉，王承裕與馬理談論雖昂說：「此子心純志篤語，他日光吾道者也。」自此語看，王承裕於馬理似乎未以師席自居。收入《關學宗傳》，卷15。

<sup>142</sup> 呂柟，原字大棟，後改字仲木，號涇野，陝西高陵人，正德戊辰(1508)殿試第一名，時人稱得真狀元，授翰林院編撰。呂柟生平頗有氣節，正德年間忤劉瑾，嘉靖初年議禮不附世宗，故卒未能大用。

<sup>143</sup> 《(光緒)高陵縣續志》(中國方志叢書，影清光緒10年刻本)，卷1，頁13。

陳溢塘，……殿西有屋蔭，當其下聚徒結廬，曰雲槐精舍。屋凡三穩，蕭然面渭，討論古經，言萃於斯，曰講經堂。堂含二室，東室曰仰華軒，西室曰望河庵。」此外，精舍還包括 15 間供外地學者居住的「廣居」、用以灑掃洗沐的「文藝井」、紅白碧紫的「菊畦」，儼然一處世外桃源。<sup>144</sup>呂柟講學於雲槐精舍的時間，大約在 1498 年問道於薛敬之以後，1501 年中舉之前。<sup>145</sup>當時，往來參與講學者，除諸生之外，還有友人何景明、康海、秦偉、崔銑(1478-1541)<sup>146</sup>等人。講學的主題，遍涉經史，而以理學為要。呂柟曾談及在雲槐精舍講「虞書」。<sup>147</sup>從語錄看，呂柟重視經學、重視節氣、重視實踐的特點當時即已形成。例如，學生問他：「今之不知時務而好談經者，皆腐儒也。」呂柟卻回答道：「六經盡時務也。」有學生稱贊建文、永樂時期楊士奇、解縉之才，呂柟說：「夫人材論於太平之時則貴文，……論於危國亡世則貴節。」崔銑說：「今有擬經為言者，人皆譏其非。」呂柟說：「擬經而言，必擬經而行。如其行之戾經也，人之譏也宜矣。」<sup>148</sup>其時馬理之講學，則主要在於弘道書院，所講為「誠敬之學」、<sup>149</sup>「反身循理之學」。<sup>150</sup>秦偉在當時，是呂柟、馬理的共同的講友，呂柟、馬理彼此間應該開始有一定的交往。在雲槐精舍時，呂柟對馬理已有較高的評價，以為馬理「見善而能聚，見惡而能勸，其志遠矣」。<sup>151</sup>這種欣賞的態度，構成呂、馬二人相知的基礎。弘治 15 年(1502)以後讀書國子監的數年中，呂柟與馬理交往頗深。在國子監，呂柟聲稱與馬理在國子監同舍 4 年，「交最厚」，<sup>152</sup>互相推崇對方的學問。呂柟還命其弟呂

<sup>144</sup> 呂柟，〈雲槐精舍記〉，《涇野先生文集》，卷14，頁1。

<sup>145</sup> 閻湘蕙，《明鼎甲征信錄》(明代傳記叢刊本)，卷2。

<sup>146</sup> 崔銑，字子鐘，一字仲鳧，初號後渠，有遺泗磬，因號少石，又號涇野、涇野子，弘治18年(1505)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右侍郎，諡文敬。其學以程朱為宗，嘗斥陽明為霸學。

<sup>147</sup> 呂柟，〈贈楊叔用知馬湖序〉，《涇野先生文集》(續修四庫全書影萬曆20年刊本)，卷9，頁15。

<sup>148</sup> 呂柟，〈雲槐精舍語第一〉，《涇野子內篇》，頁7；〈雲槐精舍語第三〉，頁13、16。

<sup>149</sup> 《(光緒)三原縣新志·人物志》：「秦偉，字世觀，為諸生時與谿田(馬理)講誠敬之學，後遊太學，偕谿田及呂涇野、張西渠(仲修)、崔後渠、馬柳泉、寇塗水相約講學，所得益遠。」

<sup>150</sup> 張驥，〈馬忠憲公條〉，《關學宗傳》，卷18，頁1。

<sup>151</sup> 呂柟，〈雲槐精舍語第一〉，《涇野子內篇》，頁6。

<sup>152</sup> 呂柟，〈馬母李氏墓誌銘〉，《涇野先生文集》，卷22，頁1。

棲拜馬理為師。<sup>153</sup>閑暇無事，二人即偕諸同志講學於寶邛寺，「明經修行，毋慕高虛，毋溺訓詁，毋耽辭，毋陷利與名，其志以洙泗為師」。<sup>154</sup>這段密切交往的歷程，隨著呂柟、馬理相繼在正德 3 年(1508)、正德 9 年(1514)進入仕途，大概就告一段落了。

正德 9 年(1514)，呂柟告歸。此後至嘉靖元年(1522)重新起用 8 年間，呂柟講學於東郭別塾、東林書屋。張驥《關學宗傳》稱呂柟家居時，「四方來學者日眾。丁父憂，與平定李應箕、同邑楊九儀輩講求古今喪禮。既釋服，復講於別塾，至館舍不能容，築東林書屋居焉。」<sup>155</sup>呂柟父呂溥逝於正德 11 年(1516)5 月。<sup>156</sup>大約以此為界線，之前講學於東郭別塾，之後於服闋後不久乃築東林書屋講學。呂柟在東林書屋的講學主題，既包含經史之學，還較多地涉及到關中講學前輩周蕙、薛敬之等人。馬理在這一階段，也參與到呂柟的講學中來。馬理在正德 9 年(1514)中進士，一年之後即謝病歸，至正德 13 年(1518)起為考功主事間居留於鄉，而正德 15 年(1520)送母歸鄉。東林書屋的講學記錄裏，留有馬理與呂柟之間談論呂柟外曾祖宋玉的一段對話，當在正德 15 年。次年，呂柟即被新即位的嘉靖皇帝召入京城，而馬理則留在三原縣，直至嘉靖 3 年(1524)被召還京。也就是說，一位講學者離開關中地區，另一位講學者卻恰好留了下來。

從正德 15 年至嘉靖 3 年，馬理先後講學於武安王祠、嵯峨書院。據《關

<sup>153</sup> 呂棲，〈棲入學儀〉，《涇野先生禮問》(叢書集成初編，商務印書館民國25年版)，卷2，頁35。

<sup>154</sup> 崔銑，〈亡友張仲修墓誌銘〉，《洹詞》(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5，頁7。按，寶邛寺講學的主要參與者，除呂柟、馬理、秦偉、崔銑外，還有張士隆、寇天敘、馬敬臣，大約七人。寇天敘，〈祭張仲修文〉：「昔遊太學，擇交天下，氣誼相許，僅吾七人。」收入《塗水先生集》，卷5。張士隆(1475-1525)，字仲修，號西渠，安陽人，弘治18年(1505)進士，授廣平推官，官至陝西副使備兵漢中。寇天敘(1480-1533)，字子惇，號塗水，榆次人，正德戊辰(1508)進士，官至兵部侍郎，其學以薛瑄為宗。馬敬臣，字柳泉，林縣人。後張舜典，〈關中四先生詠〉亦言及此事：「涇野呂夫子，矯矯崇正學。挾冊游成均，馬、崔同切琢。」收入《雞山語要·明德集》(關中叢書，民國24年陝西通志館鉛印本)。

<sup>155</sup> 張驥，〈涇野呂子條〉，《關學宗傳》，卷16，頁1。

<sup>156</sup> 馬理，〈南京禮部右侍郎涇野呂先生墓誌銘〉，《谿田文集》，卷5，頁161。

學宗傳》，馬理初「設教武安王祠下，督學漁石唐公為建嵯峨精舍以居生徒」。<sup>157</sup>嵯峨精舍在三原北城西街。<sup>158</sup>提學關中期間，唐龍曾修復正學書院，且編纂《正學書院志》，顯然是一個重視書院講學的提學官。<sup>159</sup>在唐龍及按察僉事周宗化的要求下，三原縣知縣王成章改僧寺為嵯峨書院，以供馬理講學。唐龍《嵯峨精舍記》言：

三原馬子伯循誦先王之法，希聖賢之軌。典刑所昭，風聲斯被。其諸弟子員振衣承響，喁喁以從。其集如雲，其立如林。馬子敝廬不葺，環堵蕭然，而弟子多至，無所棲止，是故來遠而居弗寧，教勤而習弗專也。僉事周子宗化行縣而知之，憮然用惻，乃議構精舍以尊其教。前令王成章曰：「此實下吏之闕也。西有浮屠氏之宮，叢穢伏奸，大隳世典，誠易置之，豈惟正之用昌，即邪亦於是乎黜矣！而況民俗罔不厘乎！」宗化曰：「善」。乃亟命毀之，亦地以為基，徙材以為宇，命之曰嵯峨精舍。……弟子雁行以居，馬子儼然而臨之，發疑待問，率以躬行，納於禮法。<sup>160</sup>

唐龍出任陝西提學的時間乃在嘉靖元年，而王成章為正德丁卯(1507)舉人，正德 15 年至嘉靖元年間任三原知縣。因此，有理由相信，嵯峨書院建於嘉靖元年(1522)。馬理的好友寇天敘曾訪馬理於嵯峨精舍，有詩「講經堂迥延英士」，<sup>161</sup>以形容當時講學之情景。當時呂柟寫信給馬理說：「比來病況猶昔，而老母在家，不獲身侍，歸心如火。但尙未能耳，遲秋冬間，想獲會晤也。邇聞學者從遊甚眾，得以復起程張之緒，斯道再明，何樂如之！」<sup>162</sup>

嘉靖 3 年(1524)，馬理起為吏部稽功員外郎。這一年，他到山西解州解梁書院探訪剛剛被謫為解州推官的呂柟，宿於書院養正堂。<sup>163</sup>此後，二人繼續

<sup>157</sup> 張驥，〈馬忠憲公條〉，《關學宗傳》，卷18，頁1。

<sup>158</sup> 《(光緒)三原縣新志》，卷4，頁17。

<sup>159</sup> 唐龍，〈正學書院續記〉，《漁石集》，卷1，頁17。

<sup>160</sup> 唐龍，〈嵯峨精舍記〉，《漁石集》，卷1，頁30。

<sup>161</sup> 寇天敘，〈訪谿田馬先生嵯峨精舍〉，《塗水先生集》，卷1，頁8。

<sup>162</sup> 呂柟，〈答谿田書〉，《涇野先生文集》，卷21，頁22。

<sup>163</sup> 呂柟，〈別解梁書院記〉，《涇野先生文集》，卷16，頁33。

浮沉於宦海：馬理偶歸關中，而呂柟則大部分時間在南京，閒暇之際則講學於柳灣精舍、<sup>164</sup>鷲峰東所、<sup>165</sup>太常南所，風動江南。嘉靖 18 年(1539)，呂柟致仕。此前，馬理在嘉靖 11 年(1532)已謝病歸鄉，並在嘉靖 21 年(1542)正式致仕。他們晚年的主要生活，除卻講學，就是編纂《陝西通志》。呂柟生命最後的三年，講學於高陵縣之北泉精舍。<sup>166</sup>楊遠征《陝西古代書院研究》認為北泉精舍建於嘉靖 17 年。<sup>167</sup>實際上，北泉精舍也許應該建於嘉靖 18 年以後。據說，高陵縣還曾有過涇野書院，<sup>168</sup>大概與呂柟應該有關。馬理晚年講學之所，有商州之商山書院。商山書院在商州城北，為嘉靖間商洛道郟元洪所建。<sup>169</sup>過庭訓言：「(馬理)歸即隱於商山書院。諸生問道者遠近踵集。山巾野服，鶴髮童顏，望而即之，飄然仙風道氣也，如是者又十餘年。」<sup>170</sup>張舜典也說：「仲晷(張仲修)稱先生(馬理)愛道甚於愛官，當世以為確論。……性喜接人，又喜汲引後生。年七十歸隱，來學者遠近踵集，縉紳過訪與海內求詩文者無虛日。先生亶亶應之不倦，山巾野服，鶴髮童顏，飄然望之若仙人。」<sup>171</sup>

概括而言，呂柟、馬理的關中講學可分為三個階段：未仕前的雲槐精舍；既仕後的東郭別塾、東林書屋、嵯峨書院；致仕後的北泉精舍、商山書院。呂、馬二人的關係很好。從學術上來說，馬理也是呂柟的知己。光緒《三原縣新志》說：「關學自橫渠，在明惟高陵呂涇野為最著，而谿田則媲美涇野。」<sup>172</sup>呂柟逝後，門人有從馬理講學者。<sup>173</sup>他們雖然沒有在正學書院、弘道書院等已

<sup>164</sup> 呂柟，〈明詔賜監察御史怡軒李君墓誌銘〉：「予之改官南曹也，居柳樹灣。」收入《涇野先生文集》，卷25。

<sup>165</sup> 呂柟嘉靖9年(1530)遷鷲峰東所，參見呂柟，〈送別程惟信詩序〉，《涇野先生文集》，卷6。

<sup>166</sup> 閻湘蕙，《明鼎甲征信錄》，卷2。

<sup>167</sup> 楊遠征，《陝西古代書院研究》，(西安：陝西師大碩士論文)，頁14。

<sup>168</sup> 《(雍正)陝西通志》，卷27，頁6。

<sup>169</sup> 《(雍正)陝西通志》，卷27，頁23。

<sup>170</sup> 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續修四庫全書，影明天啟刻本)，卷104，頁1。

<sup>171</sup> 張舜典，〈雞山語要〉，《明德集》，頁32。

<sup>172</sup> 《(光緒)三原縣新志》，卷6，頁25。

<sup>173</sup> 張驥，〈李正立先生條〉：「先生諱挺，字正立，咸甯諸生，從涇野呂子學。……呂子歿後，往三原馬谿田所講學。」收入《關學宗傳》，卷17。

成規模的講學基地裏講學，而是在各自的家鄉憑藉自身的影響開拓新的講學基地，但他們的講學亦頗有業績。據說，「自縉紳士子以至田夫野叟，無不欣慕之(馬理)」。<sup>174</sup>對於呂柟來說，他「九載南都」的講學活動所帶來的與王陽明、湛若水三分天下的影響，遠比其在關中地區的講學活動重要得多。馬理的聲名也不限於關中一地，甚至遠播於外國。因此，儘管此期的關中講學顯得相對零散，但關中講學卻藉呂柟、馬理而第一次具有全國性的影響，參與到了整個講學進程中去。他們繼承了薛瑄、三原學派及提學官講學的某些精神，又在回應王陽明講學及古文運動兩個層面上有所開拓。首先，呂柟、馬理的講學繼薛瑄之學而具有朱子學的特徵。《四庫全書總目》言：「柟之學出薛敬之，敬之之學出於薛瑄，授受有源，故大旨不失醇正」，「其學以薛瑄為宗，……不失河津之淵源」。<sup>175</sup>《明史·呂柟傳》亦謂其「接河東薛瑄之傳，學以窮理實踐為主。」其學問基本恪守朱子學之規矩——「以格物為窮理及先知而後行，皆恪守成法」。<sup>176</sup>馬理之學，雖與呂柟源頭不同，然「生平學主程朱，以主敬窮理為主」。<sup>177</sup>張驥說，馬理得呂柟、崔銑為友，故能「墨守主敬窮理之傳」。<sup>178</sup>馬理之講學，主一「敬」字，似與薛瑄一脈不無潛通之處。<sup>179</sup>馬理甚至與呂柟一樣，還去瞻仰過薛瑄的故鄉。<sup>180</sup>其次，呂柟、馬理的講學，繼承三原學派而具有重視經學的特徵。呂柟「六經皆時務」一語，足見呂柟重視經學的態度。從實踐看，呂柟遍涉群經，嘗著《五經說》。<sup>181</sup>馬理則以《春

<sup>174</sup> 《(雍正)陝西通志》，卷63，頁20。

<sup>175</sup> 〈《涇野集》三十六卷條〉，《四庫全書總目》，卷176；〈《涇野子內篇》二十七卷條〉，卷93。

<sup>176</sup> 沈佳，《明儒言行錄》(明代傳記叢刊本)，卷4。

<sup>177</sup> 《(雍正)陝西通志》，卷63，頁20。

<sup>178</sup> 張驥，〈馬忠憲公條〉，《關學宗傳》，卷18，頁1。

<sup>179</sup> 《(嘉靖)重修三原縣志》，卷6，〈馬理條〉內錄其〈語錄〉：「先生(馬理)坐，諸子侍，乃教其斂容居敬」，「方寸中常要整齊，整齊便幹得事」，「敬非只是閉門又手靜坐，要在隨事謹恪做去，若只閉門靜坐，即是禪學，有體無用」，「心不可斯須放」。

<sup>180</sup> 馬理有詩《訪薛文清公》：「先生汾水河邊住，我訪先生過水涯。北抵平陽八十裏，幾回立馬問人家。」呂柟，〈重建薛文清公祠堂記〉，《涇野先生文集》，卷16：「嘗從儲、初二公至河津謁先生(薛瑄)。」

<sup>181</sup> 于敏中，《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13言《五經說》乃「《周易說翼》三卷、《尚書說要》五

秋》魁鄉試，復能遍涉五經。<sup>182</sup>而且，由於呂柟和馬理都曾受到提學官講學的影響，他們在講學的同時，也強調科舉的重要性。呂柟的「舉業中即寓德業」、<sup>183</sup>程朱之學乃「數千年科目」<sup>184</sup>等語，極具代表性。

從種種層面看，他們的講學與 15 世紀後期的關中講學有著較強的延續性，但也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其一，他們的講學，與前七子的復古運動關係密切。前七子中的何景明、康海、王九思，都是呂柟、馬理的密友，曾經活躍於呂柟早年的雲槐精舍講學中。因此，呂柟和馬理不可避免地受到復古文風的影響。《四庫全書總目》說馬理「遺詞宅句，塗飾雕刻，其為贗古視李夢陽又甚焉」。<sup>185</sup>呂柟之文亦極高古，所作〈子畏于匡傳〉「雖王溪坡〈補周語〉、李崆峒〈擬趙高答李斯書〉，無以踰也」。<sup>186</sup>四庫館臣對此持批評的態度：「然(呂柟)頗刻意於字句，好以詰屈奧澀為高古，往往離奇不常，掩抑不盡，貌似周秦間子書，其亦漸漬於空同之說者歟？」<sup>187</sup>四庫館臣還對呂柟在文學與理學間的語言差異表示驚訝：「柟文集佶屈聱牙，純為偽體，而其解四書平正篤實乃如此。蓋其文章染李夢陽之派，而學問則宗法薛瑄，二事淵源各別，故一人而如出兩手耳。」<sup>188</sup>這似乎是說，呂柟文學上的崇尚復古對於他的理學修養沒有什麼影響。然而，在呂柟的講學活動中，文學卻也占據著重要的地位。他的語錄中，討論詩歌的篇幅不少。從這些語錄中，我們也能見到呂柟的真精神。例如，他評何景明「詩有漢魏之風，……文襲六朝之體」，就與我們素來所談前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總指導思想有差

---

卷、《毛詩說序》六卷、《禮問》二卷、《春秋說志》五卷」。據呂吉人，《涇野子內篇跋》，《五經說》本為《五經圖說》。

<sup>182</sup> 馬理的經學著作，有《周易贊義》、《尚書疏義》、《詩經刪義》、《周禮注解》、《春秋修義》、《四書注疏》。

<sup>183</sup> 馮從吾，《關中四先生要語錄》(關中道脈四種本)，卷1，頁7。

<sup>184</sup> 呂柟，〈柳灣精舍語第十一〉，《涇野子內篇》，頁58。

<sup>185</sup> 《四庫全書總目》，卷176，〈《谿田文集》十一卷補遺一卷條〉。

<sup>186</sup> 楊九式，〈呂涇野先生續傳〉，《(嘉靖)高陵縣志(附錄)》。

<sup>187</sup> 《四庫全書總目》，卷176，〈《涇野集》三十六卷條〉。

<sup>188</sup> 《四庫全書總目》，卷36，〈四書因問六卷條〉。

異，<sup>189</sup>此且不論。他評價李夢陽說：「為曹、劉、鮑、謝之業，而欲兼程、張之學，可謂系小子失丈夫矣。」<sup>190</sup>意謂文學復古派取小失大。從這一層意義上說，呂柟終歸只是一個理學家。誠如唐龍所言，「仲木之道，在器識不在文藝，在道德不在聲名。」<sup>191</sup>

其次，呂柟、馬理之講學，對於當時開始流行的王學，大體采取排斥的態度。比較而言，呂柟對王陽明講學較欣賞，甚至曾捍衛過陽明之講學，<sup>192</sup>而馬理的排斥態度更為堅決，類似於羅欽順。呂柟曾評價王陽明的講學「精足，得程氏之意」。<sup>193</sup>王陽明門人鄒守益，也是呂柟最密切的講友。然而，呂柟認為陽明講學單提「致良知」，未免偏頗，認為「聖人教人，每因人變化，未嘗規規於一方也」，而陽明「不論其資稟造詣，刻數字以必人之從」，是有偏差的講學。<sup>194</sup>當鄒守益等人以陽明之學為問時，他說：

子敢以陽明之學為是乎？子敢以陽明之學為不是乎？……昔先正以一言一字發人，而況陽明之學痛世俗辭章之煩，病世途勢利之爭，乃窮本究源，因近及遠，而曰行即知也，知本良也，亦何嘗不是乎？但人品不同，受病亦異，好內者不可與言禁酒，好奕者不可與言禁財也。……見守齊舉，知行並進，此惟聖人能。故陽明之學，中人以上雖或可及，中人以下皆茫無所歸，故《論語》不道也，亦何嘗儘是乎？雖然，自夫俗儒而言，忘其良知而又不知以行為急也，其弊至於戕民

<sup>189</sup> 《明史·文苑傳序》：「李夢陽、何景明倡言復古，文自西京，詩自中唐而下，一切吐棄」，「弘治時，宰相李東陽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夢陽獨譏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

<sup>190</sup> 呂柟，〈雲槐精舍語第一〉，《涇野子內篇》，頁6。

<sup>191</sup> 唐龍，〈狀元題名記〉，《漁石集》，卷1，頁29。

<sup>192</sup> 嘉靖2年(1523)，翰林院修撰呂柟為會試考官。時會試策為蔣冕所擬，意在陰詆陽明。有舉子對策中言「欲將今之宗陸辨朱者，誅其人，焚其書」。呂柟說：「觀此人於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出仕，必知迎合權勢。」竟棄不取。清人陳田輯《明詩紀事》談及此事時說：「癸未會試，主司發策，有焚書禁學之議，涇野力辨而解救之，得不行，此盛德事，可以愧講學攻擊者。」參見黃宗義，〈河東學案下·文簡呂涇野先生柟〉，《明儒學案》，卷8、陳田，《明詩紀事·戊籤》(明代傳記叢刊本)卷10。

<sup>193</sup> 呂柟，〈與穆司業伯潛書〉，《涇野先生文集》，卷20，頁4。

<sup>194</sup> 黃宗義，〈河東學案下·文簡呂涇野先生柟〉，《明儒學案》，卷8。



而病國，則陽明之學又豈可少乎哉？<sup>195</sup>

呂柟認為，陽明提倡良知之學，在當時有其積極的意義，對於世俗偏重於辭章而不重聖學的弊端是一種警醒，然陽明的良知之學，適合於中人以上，而不能適用於中人以下者，所謂「人之資質有高下，工夫有生熟，學問有淺深，不能概以此(良知)語之」。<sup>196</sup>馬理對於陽明的講學，則完全持排斥的態度。這集中反映在他〈上羅整庵先生書〉一文中：

續得〈答人語良知書〉二篇。先貴鄉學者傳其師說如此，理嘗辭以辟之，不意尊意正如是也。夫良知者，即孩提之童良心所發，不慮而知者，與夫隱微之獨知異矣，與夫格致之後知至則又異矣。其師曰：此知則彼知也，又以中途有悟如夢斯覺為言。此真曹溪遺裔！其師如此，徒可知矣。乃又以其見非程朱之學。夫程朱釋經之言，自今觀之，千百言中似亦有一二誤處。然語其體認宗旨之真，持守斯道之正，續孔孟既墜之緒，辟佛老似是之非，則千古不可泯滅，可遽輕議之哉？今乃往往是陸非朱，又復陰主僧說，排吾儒焉。於戲，此亦欺人自欺已也！……茂叔輩二三君子迭作，極力闡辟，吾道復明，至今三尺童子通句讀者無不排斥二氏，知趨向焉。……今乃復拾鋤去之莠，播而種之，以亂我苗，其亦不知唐虞之政、孔孟之教、斯人之功矣？夫其亦不知斯害之大矣？<sup>197</sup>

馬理把陽明之學看作為「曹溪遺裔」，顯然是將陽明學以異端處之，其排斥陽明學的態度，較呂柟更為決絕。在呂柟與馬理的通信中，應當是多次談到陽明學的。例如，呂柟曾對馬理說：「東郭執守師說，牢不可破，近與屢辯之，殆少然諾，恐亦未肯盡從也。」<sup>198</sup>表達了對鄒守益固執陽明之學的遺憾。當然，在另一面，鄒守益則委婉勸諭馬理重視陽明學。在〈贈馬伯循西歸四首〉之第三首中，鄒守益委婉地表達了這一層意思：「君未登牛首，

<sup>195</sup> 鄧球，〈《皇明沐化類編列傳》(明代傳記叢刊本)，卷44。

<sup>196</sup> 黃宗羲，〈河東學案下·文簡呂涇野先生柟〉，《明儒學案》，卷8。

<sup>197</sup> 馬理，〈上羅整庵先生書〉，《谿田文集》，卷4，頁140。

<sup>198</sup> 呂柟，〈答谿田書〉，《涇野先生文集》，卷21，頁22。

還知牛首末？傳聞非自得，懸料終疑似。何如陟其巔，萬象無遁視。歸去大華山，輕舉時自試。」也許是對於「心學」的抵觸，周蕙、薛敬之、王承裕等學者所喜歡討論的「心」的概念，無意識中也在馬理、呂柟等人的講學中淡出，當然更不敢談論「放心」。<sup>199</sup>

無論是呂柟相對委婉的態度，還是馬理決絕的態度，他們對於陽明之學的排斥是一致的。這種態度，在當時的關中地區及其友人之間，是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的。例如，康海指斥有人「著為邪說，指斥先進」，「東橋顧先生〈華玉送涇野先生〉文其萬年公案」之論、<sup>200</sup>崔銑「弘治中士厭文習之痿而倡古作，嗣起者乃厭訓經之卑而談心學，是故嘅顏後之失傳，申象山之獨造，創格物之解，剽禪寤之緒，奇見盛而典義微，內主詳而外行略矣」之論，都在陰詆陽明之學。崔銑言王陽明刪「良能」而獨提「良知」，實為「霸學」。<sup>201</sup>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流行於大江以南的陽明學，還能否在關中講學中佔據一席之地呢？

<sup>199</sup> 馬理對學生們說：「心不可斯須放。且如讀書一事，稍放心便記不得，收入腔子來，卻記得。」參見《(光緒)三原縣新志》，卷6。

<sup>200</sup> 康海，〈光訓堂記〉，《康對山先生文集》，卷25，頁11。

<sup>201</sup> 崔銑，〈松窗寤言〉，《洵詞·附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明嘉靖33年周鎬等池州刻本)，卷2，頁15。後來，高拱論陽明之學，在〈問辨錄〉：「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今遺其半而專用其半，與孟子之言不合，吾不敢從。」其論殆淵源于崔銑。收入《高拱論著四種》(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117。

## 徵引書目

### (一)原始材料

1. 《明史》
2. 《明實錄》
3. 《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
4.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
5. [明]曹于汴，《仰節堂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 [清]陳田，《明詩紀事》，明代傳記叢刊本。
7. [明]崔銑，《洄詞》，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8. [明]崔銑，《洄詞》，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明嘉靖22年周鎬等池州刻本。
9. [清]程嗣章，《明儒講學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清道光4年刻本。
10. [清]範鄱鼎，《理學備考》，道光5年補刊本。
11. [明]馮從吾，《少墟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2. [明]馮從吾，《馮少墟集》，清康熙12年洪琮刻本。
13. [明]馮從吾，《關中四先生要語錄》，關中道脈四種書道光壬辰守樸堂刻本。
14. [明]馮從吾、王心敬，《關學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15. [明]馮夢禎，《快雪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明萬曆44年黃汝亨朱之蕃刻本。
16. [明]高拱，《高拱論著四種》，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17. [明]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續修四庫全書，影明天啓刻本。
18. [明]韓邦奇，《苑洛先生語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明嘉靖白璧刻本。
19. [明]胡居仁，《居業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0.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21. [明]焦竑，《獻征錄》，上海：上海書店，1987年。
22. [明]焦竑，《玉堂叢語》，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81年。
23. [明]康海，《康對山先生集》，續修四庫全書，影明萬曆10年潘允哲刻本。
24. [明]寇天敘，《塗水先生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明嘉靖寇陽刻本。
25. [明]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萬曆39年刻本。
26. [清]李顥，《二曲集》，北京：中華書局，陳俊民標點本，1996年。
27. [清]李元春，《關中三先生要語錄》，關中道脈四種書道光壬辰守樸堂刻本。
28. [明]劉魁，《劉晴川先生集》，廣理學備考本。
29. [明]呂柟，《涇野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嘉靖43年於德昌刻本。
30. [明]呂柟，《涇野先生文集》，四庫續修全書，影萬曆20年刻本。
31. [明]呂柟，《涇野子內篇》，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32. [明]呂柟，《涇野先生禮問》，叢書集成初編，商務印書館民國25年版。

33. [明]羅大紘，《紫原文集》，四庫禁毀書叢刊，影明末刻本。
34. [明]馬理，《谿田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明萬曆間刻清乾隆17年補修本。
35. [明]馬自強，《馬文莊公文集選》，清同治庚午敦倫堂刊本。
36. [明]彭澤，《段容思先生年譜紀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影道光3年重刻本。
37. [清]沈佳，《明儒言行錄》，明代傳記叢刊本。
38. [明]唐龍，《漁石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明嘉靖刻本。
39. [明]王承裕、來時熙，《弘道書院志》，《中國歷代書院志》，影明弘治18年刻本。
40. [明]王棟，《一庵王先生遺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明萬曆39年鈔本。
41. [明]王鴻，《薛文清公行實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明萬曆16年吳達可刻崇禎重修本。
42. [清]王鴻緒，《明史稿列傳》，明代傳記叢刊本。
43. [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85年。
44. [明]王恕，《王端毅公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明嘉靖3年劉鈞刻本。
45. [明]王恕，《王端毅公文集》，明人文集叢刊，影明嘉靖31年刊本。
46. [明]王恕，《玩易意見》，續修四庫全書，影明正德元年刻本。
47. [明]王守仁，《陽明全書》，四部備要本。
48. [明]王雲鳳，《博趣齋稿》，續修四庫全書，影明刻本。
49. [民國]王烜，《皋蘭明儒遺文集》，民國石印本。
50. [清]吳焯，《繡穀亭熏習錄》，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51. [清]辛全，《理學名臣錄》，理學備考本。
52. [明]許孚遠，《敬和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萬曆刻本。
53. [清]徐開任，《明名臣言行錄》，續修四庫全書，影清康熙刻本。
54. [明]薛瑄，《河汾詩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明成化5年謝庭桂刻本。
55. [明]薛瑄，《敬軒薛先生文集》，明弘治16年刻本。
56. [清]閻湘蕙，《明鼎甲征信錄》，明代傳記叢刊本。
57. [明]楊鶴，《薛文清公年譜》，清康熙52年薛氏刻本。
58. [明]楊爵，《楊忠介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9. [明]楊一清，《楊一清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60. [明]葉向高，《蒼霞草》，四庫禁毀書叢刊，影明萬曆刻本。
61. [清]查繼佐，《罪惟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62. [明]張奮庸，《理學張抱初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影清雍正乾隆間刻本。
63. [清]張驥，《關學宗傳》，民國10年陝西教育圖書社鉛印本。
64. [明]張舜典，《雞山語要》，關中叢書，民國24年陝西通志館鉛印本。
65. [明]鄒守益，《東廓先生文集》，明刻本。
66. [明]朱國禎，《湧幢小品》，北京：中華書局，1959。
67. 《(嘉靖)陝西通志》，稀見方志叢刊，影嘉靖21年刊本。
68. 《(雍正)陝西通志》，中國省志彙編，影清雍正13年刊本。
69. 《(乾隆)重修鳳翔府志》，中國方志叢書，影清乾隆31年刊本。

70. 《(乾隆)韓城縣志》，續修四庫全書，影乾隆49年刻本。
71. 《(嘉慶)長安縣志》，中國方志叢書，影清嘉慶17年修民國25年重印本。
72. 《(嘉慶)咸寧縣志》，中國方志叢書，影清嘉慶24年修民國25年重印本。
73. 《(嘉靖)重修三原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明嘉靖14年刻本。
74. 《(光緒)三原縣新志》，中國方志叢書，影光緒6年刻本。
75. 《(嘉靖)高陵縣志》，中國方志叢書，影明嘉靖20年刊本。
76. 《(光緒)高陵縣續志》，中國方志叢書，影清光緒10年刻本。
77. 《(正德)武功縣志》，乾隆26年刊本。
78. 《(雍正)武功縣後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影清雍正11年刻本。
79. 《(雍正)渭南縣志》，雍正10年刊本。
80. 《(光緒)富平縣志稿》，中國方志叢書，影清光緒17年刊本。
81. 《(光緒)藍田縣志》，中國方志叢書，影清光緒元年刊本。
82. 《(民國)整屋縣志》，中國方志叢書，影民國14年刻本。
83. 《(乾隆)寶雞縣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影乾隆29年刻本。
84. 《(萬曆)郃陽縣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影清順治6年刻10年增修本。
85. 《(乾隆)紹興府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影清乾隆57年刊本。
86. 《(同治)湖州府志》，中國方志叢書，影同治13年刊本影印。
87. 《(民國)德清縣志》，中國方志叢書，影民國12年修、20年鉛印本。

## (二)近人論著及工具書

1. 《辭海·地理分冊·歷史地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8。
2. 陳谷嘉，鄧洪波，《中國書院制度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3. 陳俊民，《張載哲學思想及關學學派》，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 陳時龍，《明代中晚期講學運動(1522-1626)》，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5. 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6. 吳震，《陽明後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7. 張學智，《明代哲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8. 陳俊民，〈關學序說〉，《陝西師大學報》，第35期(西安，1982.06)。
9. 陳立勝，〈王陽明「四句教」的三次辨難及其詮釋學義蘊〉，《臺大歷史學報》，第29期(台北，2002.06)，頁1-28。
10. 李曉東，〈關學的範圍及特點〉，《西北大學學報》，第38期(西安，1982.05)。
11. 馬序，施培新，〈段堅和他的哲學思想〉，《西北史地》，第13期(蘭州，1984.04)，頁104-106。
12. 武占江，孟昭信，〈關學、實學與心學〉，《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9卷第4期(西安，1999)。
13. Grimm, Tilemann. "Education Intendants," in Charles O. Hucker, ed.. *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 Seven Stud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 The Jiang-xue Activities in Guanzhong District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Chen, Shi-long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ontrast to the popularity of yang-ming school's lecturing movements in southern China, the lecturing movements, namely jiang-xue, seems more quiet and peaceful in northern China. The jiangxue movement in Guanzhong district may b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in northern China. It also shows very different character. Originated from Xue Xuan, the thought and movement became more and more accommodated to the Guanzhong district, by the efforts of Xie's disciples, Duan Jian and Zhou Hui. In the later fifteen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sixteenth century, Wang Shu, Wang Chenyu, and some education intendants, advocated and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academy(shuyuan), which founded a good groundwork for the movement. Then, Lu Nan and Ma Li, became the most famous lecturers at the beginning of sixteenth century.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also some famous scholars, such as Nan Daji and Yang Jue. Nan was a disciple of Wang Yangming. His lecturing movement brought Guanzhong new atmosphere. Yang Jue contracted with Yangming's disciples for a long time, but he never trusted Yangming's doctrine. After a long silence, a new education intendant, Xu Fuyuan, came to Guanzhong, which revived the lecturing movement in later sixteenth century. Xu's lecturing movement, brought Zhan Roushui's thought. His disciples, Feng Congwu and Zhang Xudian, became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s in later Ming's lecturing movement. Broadly speaking, the movement in Guanzhong district, was a process of impacts, absorb, and respond of all kinds of thought. At the same time, the scholars can adhere to their traditions, for example,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classics and etiquette, the consciousness of Guanzhong's Neo-Confucian orthodoxy. They constructed a relatively lonely world in the later Ming 's lecturing movement.

**Keywords: lecturing movement(jiangxue), Guanzhong, Ming**

